

2814

# 語言學論文選譯

第四輯



科学出版社



# 語言學論文選譯

第四輯

高 晶 齋 譯



科 学 出 版 社

1957年6月

А. И. СМЕРНИЦКИЙ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И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ЯЗЫКОВОГО  
РОДСТ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55

內 容 提 要

本書用印歐語的材料討論和闡明历史比較方法的一些理論問題：历史比較法的實質、应用範圍、可靠程度、比較的原則、它的缺點和局限性等等。是研究历史比較法、比較語法、語学史等一般問題的參考書。本書是莫斯科大学語言學小叢書之一。

語言學論文選譯（第四輯）

（历史比較法和語言的親屬關係的確定）

А. И. 斯米尔尼茨基著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輯

高 晶 齋 譯

※

科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1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1957年6月第一版 書号：0802 印張：1 13/16

195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京）0001-6,385 字數：46,000

定价：（9）0.28元

## 历史比較法和語言的亲屬关系的确定

1. 在馬尔的“語言新學說”統治的年代里，逐漸形成了關於語言學中的历史比較法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傳布的范围相当广泛，尤其是在語言学家中間）：認為語言學中的历史比較法虽然跟馬尔的“古生物学方法”有显著的不同，但依然是可以与“古生物学方法”对照的一种方法。因此，必須再一次地着重指出，馬尔的“方法”根本不是什么科学方法，因为依照斯大林对这个方法所做的一針見血的結論來說，它只能引起“無意义的推敲猜想而已”<sup>①</sup>，而不是引导人們去研究語言的真实發展情况。历史比較法尽管有它的不少缺点，但确是研究語言及語言史的一种科学方法。因此，它值得十分認真地重視、批判地研究和改善，至於馬尔的四要素分析“方法”是怎么一回事，那是不值一顧的；这个“方法”已經被揭穿了，它是語言學中別開生面的魔术，根本不值得进一步加以任何批判分析，因为它完全是科学范围以外的东西，而且我們决不会从中得到有益於語言學的什么东西。

2. 但是，使历史比較法恢复它应有的地位，又不應該引导到把它过分重視的地步（在这个方法受到馬尔門徒們的長期迫害之后，把它过分重視是很自然的）。当然，問題不在於用任何人为的方法去限制这个方法的应用。凡是这个方法能够得到可靠的效果的地方，都可以而且應該採用它。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个方法不是随处都可以应用的，它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同样可靠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學不能局限在这个方法所研究的問題範圍以內，不能局限在年青語法學派（младограмматики）及其直系門徒們的眼界所局限的那些一般

---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2頁。

問題和概念的範圍以內。必須記住，馬克思主義語言學是最先進的語言學，未來是屬於它的，這種語言學的多式多樣的任務和廣泛的興趣，要求創制出並且應用那些進行專門研究的各種具體方式方法，要在一個总的認識方法——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基礎上，把這些方式方法組織成為進行語言科學工作的統一的、複雜的體系。

復活歷史比較法，需要對它進行創造性、批判性的研究，特別是要明確斯大林曾經讓語言學家注意到的它的嚴重缺點。明確這些缺點，並不是要使這個方法受到損害，而是加強這個方法，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明確了這些缺點，就要去探求和改善語言學研究的其他個別方式，而這些方式就會給歷史比較法以必要的幫助，因而就補充和加強了這個方法。歷史比較法能夠提供什麼和不能提供什麼，它在什麼地方可以應用而什麼地方不可以應用，我們對於這點知道得越明確，那末就會越好地去運用它，它就會提供出越多的、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而且在運用它的時候也就會少犯錯誤。同時，也就能夠更快地、更好地創制出補充它的其他語言學研究方式。

既然把語言學中的歷史比較法看作對語言材料進行科學研究的特殊方式，有自己的應用範圍和自己的特別任務，那末自然首先就要弄清楚：這個方法的實質怎樣，運用它的時候所遵循的原則怎樣，用它能够達到怎樣的效果以及怎樣才能判斷所得結論的可靠程度。

3.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必須把作為語言學研究的特殊專門方法的历史比較法同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區別開來。

某種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顧名思義，是從某種語言的历史發展並與其他一種語言或幾種語言相比較中研究該種語言。如果被比較的一切語言在進行這種研究中或多或少成為同等重要的研究對象，十分顯然，那就不是對某一種語言（其他幾種語言用來同它比較，只是為更好地了解它），而是對特定的一羣語言進行研究。在彼此具有親屬關係的語言（如斯拉夫諸語言、羅曼諸語言、日耳曼諸語言，以及

一般的印欧諸語言；烏戈爾-芬蘭諸語言，突厥諸語言）的比較語法中，我們就看到這種研究的例子。同時需要指出：這種語法中的歷史要素，通常是不够突出的，正是因為如此，這種語法才稱為比較語法，而不稱為歷史比較語法；但是，因為各別語言的一般輪廓和特點既然這樣或那樣地同這些語言的過去有联系，所以歷史要素在某種程度上說總是存在的。

所謂比較語法，大半只是涉及某些語言歷史中某一個開始時期：這些語言結構的後來的歷史，則由這些語言中每一種的歷史語法（如果這一種語言具有相當多的文學傳統的話）分別地加以研究。但是，如果某種語言沒有這種傳統，或者根本沒有文字，那末，很顯然，它的結構的全部歷史只有在有關的語支的比較語法所能闡明的範圍內加以闡明。

在原則上說，不一定把比較語法和歷史語法區分開來。上面已經指出過，比較語法在某種程度上說不可避免地也是歷史比較語法。但是某一個具有親屬關係的語支中各別語言的歷史語法，由於採用同一語支中其他語言的事實以資比較，才可以成為歷史比較語法。由此可見，某一語支中各語言的歷史語法可以融合成所有這些語言的統一的歷史比較語法。既然如此，通常所理解的比較語法的基礎，不是由各別語言的歷史語法所奠立的，而是由新的歷史比較語法所奠立的<sup>①</sup>。如果再把歷史比較詞彙學以及對某些語言發展的一般條件和形式（它們的方言分化，它們文字的作用和特徵，它們的文學規範的創立，它們的使用範圍等）的研究，也列進歷史比較語法，那末就可以窺見某一語支中各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的全貌<sup>②</sup>。

4. 某一語支（語系、語族等）中各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負有各式各樣的廣泛任務：闡明某些語言的起源；確定它們之間的历史關係的性質，尤其是它們的親屬關係的性質；研究各個語言平行發展的原因

① 參看 A. И. 斯米尔尼茨基：《日耳曼諸語言中元音弱化和名詞語法體系的历史之間的相互關係》，蘇聯科學院院報，文學語言部，第 10 卷，第 2 分冊，1951 年。

② 必須記住：當說到比較語法和歷史語法時，依照慣例，都包括語音學在內。

和它們分歧的原因；闡明一種語言影響另外一種語言的條件和途徑等。

因此，依賴於解決更一般的任務所必須得到的哪些局部的具體結果的不同而使用的各種不同的專門方式方法，是對語言作整個的歷史比較研究所利用的。

例如，為要闡明一些語言的平行發展的原則和它們之間分歧的原因，很顯然，必須首先明確一致和差別的事實；並且在對比了真正互相關聯的事實之後正確地敘述出來。要做到這點，歷史比較研究應該運用比較描寫方法，即用有時人們所稱的對比方法。

借助於這個方法，科學地描寫某種語言的事實，與其他語言的有關事實進行比較，以便得出這些語言體系之間相互關係的鮮明圖景，而這種圖景可以反映出各個部門之間的真實聯繫和正確地把本質的東西及非本質的東西區分開來。

例如，假定我們研究關於印歐諸語言中的冠詞這個問題，並且在開始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以希臘語作為應用冠詞（限定冠詞）的最古語言進行研究。我們在这种情况下，應該比較什麼東西和怎樣進行比較呢？我們是否必須循着在其他語言中尋求希臘語中大多數冠詞形式作為冠詞詞根的一t—這個詞根這種途徑來進行呢？（比較：陽性單數第四格 ton，陰性 tēn，中性 to，陽性複數 tous，陰性 tas，中性 ta 等。）如果是這樣，在與羅曼諸語言作比較的時候，我們一定會注意到，含有同樣詞根的拉丁語代詞和副詞在其中是如何反映的（拉丁語的 is-t-e [這個]，t-alis [這樣的]，t-antum [這樣]，t-um [當……時候]……），而看不到羅曼諸語言的冠詞，因為它們的冠詞的根，是完全不同的（在大多數語言中，冠詞都是上溯於拉丁語的 ille—illa—illud [那個]）。是不是應該跟在功能上相應的單位進行比較呢，就是說，例如跟意大利語的 il(lo)—la，西班牙語的 el—la—lo，法語的 le—la，羅馬尼亞語的 -(u)l, -le—(u)a（起源於拉丁語的 ille—illa—illud）這些在材料上與希臘語 -t- 沒有共同之處的單位進行比較呢？（保加利亞語的 мъжът, жената 中的 -т, 德語的 der



—die—das 中的 -d-，英語的 the 中的 -th- 等，反而同希臘語的 -t- 相同)。是不是比較應該依照兩個方向——材料的对应和功能的对应来进行呢？但是怎样进行？依照怎样的方式进行？比較描写法（对比法）就應該解答这些問題。

其次，如果根据文献的研究，确定所比較語言的历史，那就必須明确这些文献含有詞語的讀音，有时还須明确它們的意义。必須始終記住，文献本身並不是某种語言写成的文字的某些片断：它們只是特定作品的外部的近似描繪。当我们閱讀現代文字的时候，一般說來，我們也遇到同样的情形，但是在这种場合，我們很清楚地知道某种語言的語音方面是怎样在文字中描繪出来，因此，我們也就毫不困難地和有把握地复制相应的作品。至於古代文字，那末就需要依照字体記載来应用構拟語言的特殊方法，因为古代語言是不可能直接观察的，也不可能把写作的东西拿来同語言的真实語音进行对比。在这里，問題可能是關於明确个别字母的讀法和關於确立个别詞的意义，也可能是關於全部現有記載的完全解讀，因此，在这方面可能特別应用不同的方法。

語言史既然同应用某种語言的人民的歷史緊密联系着，那末各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不可能不引用社会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归結到考古学和人种学的材料。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种学都有其專門的研究方法。但是採用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种学的材料来解决語言学的問題，还需要創制特殊的研究方法。

在这里提到的远不是完备的，但是已經說过的話，就充分地表明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所須要的一套方法的复杂程度。

历史比較法，严格說來，是这一套方法中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sup>①</sup>。它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它所达到的直接的具体結果如何？

5. 用历史描写法进行工作，往往就必須去構拟（再造）那些比起直接或在文字中記錄下来的資料之前更加久远的事实：在某些事实之間所看到的那些相互关系，往往只有在構拟这些相互关系如何借

以形成的資料的條件下，就是說，只有在這些事實以前存在的那些事實的基礎上，才能夠理解和說明。

譬如，我們斷定德語的指示代詞和冠詞 *der—die—das*，英語的冠詞 *the* 等的詞根，就是斯拉夫語在 *ta—to—tomy* 等詞中的 *-t-* 和希臘語冠詞中的 *-t-* 同樣的一個詞根，那末我們就應該證明：這裡的問題不是在於偶然相似和符合，而是有規律性的歷史聯繫。這就是說，我們應該構擬這種聯繫，亦即構擬某種相互關係之前就存在的那些事實。在這個具體例子中，先行存在的事實是依照下面所說那樣加以科學的構擬的。

\**-t-* 是共同印歐語指示詞的一個語根；依據各有關語言的一般發展規律，這個 \**-t-* 保存在希臘語、民間拉丁語、各斯拉夫語言以及其他許多語言中，但是在各日耳曼語言中已經不是一個閉塞音，而是舌前齒音的一個摩擦音了：在古代文獻中，這個音是寫成北歐古代文字 *ṭ*，這是借助於拉丁書法 *-th* 這個字母組合造成的，後來在古英語的拉丁書法中，開始由 *ṭ* 變為 *θ*。隨後，在德語中 *ṭ*（寫成 *th*）這個音就一般地發展成 *d*（通過 *θ*），而在英語中則在大多數場合下還保存着（比較德語中 *denken* [想]，*ding* [事物]，*dicke* [厚]——英語中的 *think*, *thing*, *thick*），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則讀音像冠詞 *the* [*θ*]（並比較 *this* [這個] 等詞）。

在這裡，從共同日耳曼語的 *ṭ* 到德語的 *d* 和到英語的 *ṭ* 和 *θ* 的發展，是可以依照文獻探尋其線索的。但是從共同日耳曼語的 *ṭ* 到印歐語的 *t* 的發展，只有用歷史比較法加以構擬。但是為了構擬這個發展，很顯然，必須構擬作為共同印歐語語音系統的一個事實的 \**t*，因為共同印歐語的語音系統，是各個印歐語言的語音系統的基

① 必須指出，在這裡所談的，不是關於“研究”和“方法”這兩個詞的區別和定義問題，而是現象本身的區別問題——即區別較廣泛的、各式各樣和一般的現象同比較狹小的、單純的和進入前一體系中的特殊現象的問題，至於“方法”這個詞之表明第二種現象適宜到何等程度，並不是基本問題：對於在這方面從事具體工作的語言學家來說，“歷史比較法”這個複合術語當然具有比較狹小的、專門的意義，因為細心的分析，亦即區別歷史比較研究的各別方式，才有真實需要。

础。同时,还要構拟作为远古印欧詞素的  $*-t-$  这个指示詞詞根;其他各种詞素、詞、个别的語法形式等,也是依同样方式構拟出来,因此,所研究的語言的各种要素和單位之間的現存历史相互关系,就可以得到說明,而确定相应时期这些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的途徑也就指出来了。

6. 从以上所說,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对語言进行历史比較研究所需要的特殊方式之一的历史比較法,可以下个这样的定义:

語言学中的历史比較法,从这个術語的專門意义來說,是这样一种进行構拟的特殊科学方法,即用有計劃地比較兩種或几种具体語言(根据文獻或直接根据口語中活生生地应用而为人所熟知的語言)中在物質方面彼此对应的較晚事实的方法,來構拟(再造)未經文字記載的过去語言事实这样的特殊的科学方法。

所謂历史比較法是一个进行構拟的方法,决不等於說,过去語言事实的構拟本身是一个目的,像 19 世紀中叶的語言学(以及部分地說更晚近的語言学)所常常認定的那样。实际上,語言学的構拟的作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語言学的構拟本身,並不是一个独立的目的,而是說明在語言之間所看到的关系和这些語言中不同現象的一个手段,所必要的一个条件。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要能了解‘本国語的材料及形式’,就只得追溯它的發生及其逐步的發展,如果一不顧本国語言自身的已死形态,二又不顧同类的[親屬的——譯者註]活的語言及死的語言,那末上述这种了解,也是不可能的”<sup>①</sup>。显然,構拟比較远古的事实,就会幫助我們理解某种語言“已死形态”以及理解該語言和它親屬的活語言和死語言之間的相互关系。並且重要的是,还要考虑到:語言發展的一般重要特点,正如斯大林特別指出的,就是新質要素的逐漸积累和旧質要素的逐漸衰亡。因此,在某一个时代的語言中,不可避免地不但有基本上只是这个时代特有的那种性質的要素,而且还有旧質要素,这些旧質要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38頁。

索，是某種語言在其發展的以前各時期（連久遠的時期也包括在內）所特有的。此外，如果注意到所研究的某種語言的各種特點的形成所經歷的那個長遠的時代，甚至很悠久的文字傳統也是比較短近的，因此，超出文字傳統的限界，至少是局部地進一步研究某種語言的更久遠的歷史，這是為了達到更充分地科學地理解這種語言和研究它發展的內部規律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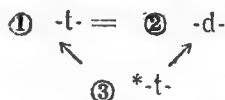
上面所談的是關於構擬具體語言歷史的事實，而不是關於構擬過去未經文獻記載的這些語言自身，這樣說法決不是偶然的。我們屢次指出：要構擬任何一種語言的整個體系，因而要構擬某種語言任何一個已往的，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階段，乃是不可能的：能夠構擬的，只是過去體系的個別部分，只是或多或少的一些事實，而不是已經消逝的包括全部組成和結構的整個體系。但是，儘管時常指明這一點，在具體工作中依然常被遺忘（在概括性的參考書一類的著作中，尤其是如此，這種情形的顯明例子，就是 A. 梅耶的《印歐族語言比較研究引論》這部有名的著作）。由此可見，用歷史比較法可以進一步研究的，不是語言古遠的全部歷史，就是說，不是它的歷程的全部範圍，而只是個別部分，個別支流（關於這點，詳見下文第 31 節和 33 節）。

但是也不應該輕看能夠構擬出來的東西。雖然構擬的不是整個語言過去的全部體系，而只是這個體系所含的某些事實，但是這些事實是可以在某一相互聯繫中構擬的，是作為體系的組成部分，而不是作為完全零散現象。凡是僅能在很零散的、不完整的狀態中構擬的，那就是原有面貌的詞彙。因此，一般說來，在歷史比較法的基礎上通常創立某一個語支的比較語音學和比較語法學（比較語音學和比較語法學通常總稱之為比較語法學）；而比較詞彙學則沒有加以相應的研究（構詞法除外）。

無論如何，凡是能夠加以構擬的東西，對於研究有關語言的已有文字的往後的歷史或現狀，特別是對於研究它們的語音構造、語法構造以及構詞體系來說，都有巨大意義。

7. 应用历史比較法的最一般的前提,就是在某些語言中有同一起源的單位,即起源於同一單位的一些單位的存在,而這些單位乃是這個同一單位在各別語言中不同發展的結果。

例如,希臘語冠詞的根  $-t-$ , 德語冠詞的根  $-d-$ , 是同一起源的根。就是說,它們在起源上是同一个根,往往把这个根的更古形式構拟为印欧語的  $*-t-$ 。可以用圖表示如右:



从上面的例子就可看出,同一起源並不一定是質的符合:希臘語的  $-t-$  和德語的  $-d-$

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起源的單位之間的差別,可能很大:比較印欧語的詢問詞的根

說明: ①希臘語的; ②德語的; ③印欧語的。

$*-k^u-$ , 而這樣的根在希臘語為  $-p-$  和  $-t-$  ( $póteros$  [二者之中哪一個],  $tis$  [誰],  $ti$  [什麼]), 在拉丁語中為  $-qu-$  ( $qualis$  [怎樣的],  $quis$  [誰],  $quid$  [什麼]), 在各斯拉夫語言中為  $-k-$  和  $-č-$  (比較俄語的  $который$  [哪一個],  $кто$  [誰],  $кого$  [誰; 第二、四格],  $что$  [什麼],  $чего$  [什麼; 第二格]), 在哥德語中為  $-hv-$  ( $hvas$  [誰],  $hva$  [什麼]), 在德語中為  $-w-$  ( $wer$  [誰],  $was$  [什麼]), 在古英語中為  $-hw-$  ( $hwā$  [誰],  $hwæt$  [什麼]) 和  $-h-$  ( $hū$  [如何]), 英語中在  $who$  [ $hu:$ ] [誰] 和  $how$  [如何] 以及其他詞中的  $-wh-$  [ $-w-$ ,  $-hw-$ ] ( $what$  [什麼],  $why$  [為什麼]等), 都是由古英語  $-hw-$  而來的。這中間區別是很大的,如果不对一切事實進行仔細的嚴密科學的歷史比較分析,這些不同語言的單位的同一起源,就顯得是可疑的甚至顯得是不可靠的。但是這種同一起源的情形,用歷史比較法就得到完全不容置疑的證明。

8. 不同語言中兩個單位的同一起源,正如從上面舉出的圖解中看到的那樣,是基於兩個歷史的等同現象:例如,希臘語的  $-t-$  = 德語的  $-d-$ , 這種同一起源就是基於歷史等同現象: (1) 希臘語的  $*-t-$  = 印欧語的  $*-t-$ ; (2) 德語的  $-d-$  = 印欧的  $*-t-$ 。

從這個例子就得出結論: 歷史等同現象是某一單位在它的時間發展中的等同現象,也就是,某一單位的個別歷史發展階段的等同

現象。這時，該單位是否發生變化，並不改變問題的本質。例如印歐語的  $*-t-$ ，保持不變，發展成希臘語的  $-t-$ ，但是在發展成德語的  $-d-$  時，就發生了變化了；但是，在兩個例子中，我們遇到某一單位在其整個印歐語階段（印歐語的  $*-t-$ ）和在其較晚近的不同語言階段（希臘語的  $-t-$ ，德語的  $-d-$ ）的歷史等同現象。

上面所說的，需要對一般的語言單位的等同現象稍加解釋。

我們假定甲、乙、丙三人讀  $\text{рыба}$  [梭魚] 這個詞。甲把  $\text{ри}$  讀為長軟音 [ʁ] 的 [rr]，乙讀為 [rrʁ]，丙讀長硬音 [ʁ] 的 [rrr]。儘管如此，我們毫不猶疑地說，我們聽到的是同一個俄語詞。這只是  $\text{рыба}$  的三種讀法，並不是三個詞——[rʏʁe]，[rrʁe]，[rrrʏʁe]。問題在於：這個詞在其各種讀法中，不但有共同的東西，而且在用俄語交際的時候，在俄語使用的整個範圍內（在文學語言中和在各種方言中）都是起着俄語體系中一個單位的功能。

我們還可假設：在語言由一代傳遞給一代的時候，在某些單位中出現了一批批的新的細微變化，以致最後某些單位變化得“認識不出來”。但是如果在同時生存的各代人之間（例如在“祖輩——父輩——子女輩——孫輩”之間）交際的時候，在構擬這些單位的差別時只是具有同一一些單位不同形式之間的差別這樣的性質，就是說，每一種這樣變化着的單位雖然在變化着，但是依然起着同一單位的功能，那末在該單位的歷史發展中，並沒有發生過中斷：它依然作為同樣的單位一代代地傳遞下去，因而就是當着最後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的時候，它在歷史上依然還是同樣一個單位。例如，一個人在他的一生中，總是同樣一個面孔，雖然在七十歲時他已經完全不是像七歲時那樣的面孔了。

我們知道，德語的  $-d-$  是從印歐語的  $*-t-$  經過日耳曼語的  $-þ-$ ，古德語的  $-ð-$  的階段發展來的。發展的道路，可以從下表比較詳細地想像得到。

在這裡，用 / 這個符號將各代之間交際時作為同一讀音的不同變音而同時存在的讀音聯接起來，> 符號是表明發展的方向，而且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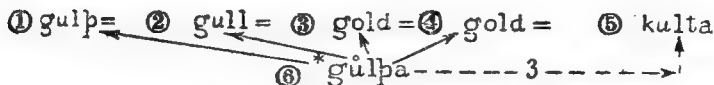
①  $\begin{matrix} \overset{1}{*t} \rightarrow \overset{1}{*} - \overset{1}{t} - / , * - \overset{2}{t^h} \rightarrow - \overset{2}{t^h} - / - \overset{3}{t^p} \rightarrow - \overset{3}{t^p} - / - \overset{4}{t^b} \rightarrow - \overset{4}{t^b} - / \\ - \overset{5}{t^p} \rightarrow - \overset{5}{t^p} - / - \overset{6}{p} \rightarrow - \overset{6}{p} - / - \overset{7}{p^{\delta}} \rightarrow - \overset{7}{p^{\delta}} - / - \overset{8}{\delta} \rightarrow - \overset{8}{\delta} - / - \overset{9}{d\delta} \rightarrow - \overset{9}{d\delta} - / - \overset{10}{d} - \end{matrix}$

說明：①印歐語的。

地把發展的个别阶段划分开来。正如从表中看到的，任何地方也沒有間断，因为比較早的变音之一（例如变音  $-t^h-$ ）在更久远的  $-t-$  中仍然出現，就是在比較晚近的  $-p-$  的阶段中，也是作为一个变音保存了一个时期，而在不同时期存在的  $-t-$  和  $-p-$  两个阶段之間形成联接的环节。当然，在这里只是十分相对地近似地描繪出个别的讀音来；也許，一般的發展进程不完全是这样，但是这並不改变問題的本質——逐漸的傳遞，即一代代相傳，虽然發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但是历史的等同現象却由此而确立起来。

9. 从上述一切就可得出这样結論：非親屬的語言中，如果存在同一起源的單位，那末历史比較法也是可以应用到这些語言的。例如这个方法可以应用来一併研究日耳曼語和西芬蘭語，因为像芬蘭語中的 kuningas (国王)、rengas (戒指)、kulta (黄金) 等詞，与古德語的 kuning (国王)，古英語的 cyning (国王)，古冰島語 hringr (戒指)，古德語和古英語的 hring (戒指)，哥特語 gulþ (黄金)，古冰島語 gull (黄金)，古德語和古英語的 gold (黄金) 等詞历史上都是分別地相同的：在这里，不但可能进行簡單的对比，而且也可能在比較的基础上加以構拟。例如，借助於历史比較法，可以構拟古日耳曼語的  $*g\ddot{u}lpa$  (黄金)，並以之作为芬蘭語 kulta，哥特語  $g\ddot{u}lþ$ ，古冰島語 gull (另外一种写法是 goll)、古德語和古英語的 gold 的共同起始阶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注意：芬蘭語和各日耳曼語詞的起源方面的等同，是建立在不同性質的历史等同的基础上的；芬蘭語的詞是从古日耳曼語（共同日耳曼語）的  $*g\ddot{u}lþ$  借用来的，而較晚近的各日耳曼語的詞是古日耳曼語的往后的历史阶段，而这些历史阶段

是在各日耳曼語以共同的基础語言(母語)逐漸發展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情形可以用下圖表示之:



說明: ①哥特語的; ②古冰島語的; ③古德語的; ④古英語的; ⑤芬蘭語的;  
⑥共同日耳曼語的。

在圖中,橫的虛線表示的,不是某種語言與它的整個體系中內部的逐漸發展,而是由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移”(同時具有這些語言的體系之間的差別所決定的變化),就是說,是表示借用關係。但是無論如何,芬蘭語 kulta,總是與日耳曼語的 \*gūlpa 有歷史等同關係的,因為在借用的過程中,這個芬蘭詞也正是在芬蘭語中重制的日耳曼語的 \*gūlpa。

大家知道,在研究各親屬語言時,歷史比較法具有最大的意義:它的主要應用範圍就在這方面。這種情形的直接原因在於:各語言如有親屬關係時,同一起源的東西已經不是個別的詞,甚至不是個別詞的一部分,而是各個語言的本身了:本來語言的親屬關係,就是從一個共同來源發展出來的事實,就是同一個比較悠遠的語言的繼續。

因此,不能不注意到對語言親屬關係樹立明確地、清晰地理解的重要性。語言學家普遍地利用這個用語,但是遠不是所有的語言學家都賦與它同一概念,而且各自的概念也不是時常都是十分明確的。馬爾的“新學說”以及他關於親屬關係是由於交配、“匯合”和“階段”的改造而形成的那種理論,就使語言親屬關係的理解特別混亂不清。

為要使語言親屬關係的問題明確起見,首先必須清楚地分別以下兩個關鍵:(1)某些語言的親屬關係自身;(2)這些語言之間事實上的近似。

10. 語言的親屬關係是起源於在不同使用地區得到不同獨立發展的一種語言歷史事實。



但是“起源於一種語言”是什麼意思呢？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弄清楚“同樣一種語言”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必須一般地確定語言等同現象的概念。

應該這樣去理解語言的等同現象：

語言的一切不同的組成部分（詞、詞的構成、變化和組合的類型、造句手段等）彼此由相互依存關係這樣或那樣地結合成多種多樣的、但是明確的體系，這種體系是由於語言的組成部分之間在正常交際的過程中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而它們之間相互作用又彷彿成了某種統一的、沒有重要脫節的“網”；凡是有這種情形的地方，那末該種語言就是等同的語言（雖然是有不同的變體，但依然是同一種的語言）。

“體系”這個詞需要稍加解釋。在這裡，不可以把它理解為“系統性”、“連貫性”和“條理性”的同義詞。大家知道，在語言中，系統性可能很有限，在語言中可能有許多不連貫的地方、矛盾和很大的無條理性。但是無論如何，在某種意義上說，語言是某種程度上完整的體系。它的一切部分、它的組成單位和它應用的規律性歸根到底是彼此聯繫着的；它們是互相制約的，而且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在一定社會關係下、在整個社會的一定文化程度和一定眼界的條件下，組成思想交流所必需的某種整體。問題不在於或大或小的系統性，而在於語言的任何單位，甚至是最特殊的、非標準的單位，在語言中依然佔居十分明確的地位，而且與其他單位處於一定的關係中，因此，如果不估計到這些關係，就不能完全理解任何一種語言單位。例如，俄語中 *шел*（行走，過去時）這個單位是理解為 *идти* [走]（*иду* [我走] *идёт* [他走]）這個動詞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理解為另外一個單獨的詞，這不僅因為這個單位是指材料上同樣一個行動——運動，而且也因為俄語中時間的差別通常只是用詞形變化的方法來表示的。同時保留同樣的詞根，像在 *нес*（帶，過去時）——*несу*（我帶）——*несёт*（他帶）；*говорил*（說，過去時）——*говорю*（我說）——*говорит*（他說）等裡頭一樣。重要的是，無論如何不可以把語言看作是不同單位

(首先是詞)的簡單总和。这样單純地去理解語言,是馬尔創立機械的交配理論的前提之一。

大家知道,語言可能是十分不一律的,在方言上是分裂的。在不同的应用範圍中有特殊化的情形——但是只要語言的不同类型或变种處於活生生的相互作用之中,而且是在某一社會的範圍內用作始終不斷的交際網的那種同一体系的變形,那末語言依然還是一個語言。在这样相互作用之下,不可避免地發生確定的(雖然也有局部的、差別的)語言單位的等同現象。例如,在方言之間交際的情況下,在甲方言中  $x^a$  一詞和在鄰近的乙方言中和它相應的  $x^b$  一詞,不可避免地彼此發生等同現象,並且起着一個單位的職能(例如, он [他] 与 он [他, 方言詞], гриб [食蕈] 与 гриб [食蕈, 方言詞], 中性的 полотенце [面巾] 和陽性的 полотенец [面巾] 等),在这一切例子中,不同方言中相應的詞,在彼此關係上並不是別的詞,只是同樣一個詞的不同方言變形(例如,上面關於 щука [梭魚] 的不同變形所說的話,見上文第 8 節)。甚至完全不同的詞如  $y^a$  和  $z^b$ (例如 вереск [石南]——можжевельник [杜松]),也還是可以說一種語言範圍內類似的同義詞,而不是像不同語言的兩個詞那樣——因為它們還是滲入同義詞的範圍內。由此可見,一個語言的各種方言不是总和,而是統一,而該種語言的等同關係就在這種統一中多式多樣地表現出來。

只要是在鄰近的甲方言和乙方言的代表者之間的交際中应用兩種方言,只要是在乙方言和丙方言、丙方言和丁方言以及最後丁方言和戊方言的代表者的交際時,也看到這種情形,那末我們就有統一的交際網,因而,就是用同一語言的交際,甚至相離較遠的甲方言和戊方言彼此或多或少地不能理解,但這些方言依然都是一種語言的方言。其實,就是這兩種相距較遠的方言,也依然是通過乙方言、丙方言和丁方言的媒介彼此聯繫着的,而其中每一種方言的發展都會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另外一種方言的發展的。因此,無論相距較遠的方言之間的分歧如何大,而這種分歧總是有限的。例如,暫且假定,鄰近的方言之間的差別,不能超過某種音值  $d$ , 因為方言間的交

际要求鄰区人們的相互理解，那末甲方言与戊方言虽然不是在交际中直接相遇，並且也許不能相互理解，但這兩种方言的分歧不会超过41，就是說，这种分歧仍然是十分有限的。但是不同語言之間的分歧，就会大得多。

11. 在这里關於具有相应变化的各方言統一性所說的話，一般說來，也适用於語言的不同变形(变体)的統一性，也适用於語言在其不同变形中的等同現象。这里沒有必要來考察同样一种語言的各种变体之間的各式各样的相互关系的例子，因为在这里重要的只是着重指出語言的等同現象与同一形式之間的差別，指出該語言各种变形之間的統一性以及它們之間的或多或少的外部近似之處。大家知道，語言永不会是完全一样的，永不会在它的一切应用範圍中絕對地千篇一律，这个事实就使年青語法學派及其門徒們得到严重的錯誤論斷；他們武斷地說，归根到底个人的語言才是唯一真正实在的。甚至沙赫馬托夫也武斷地說：“每个人的語言才有真实的存在；乡村、城市、州、人民的語言显然是某种程度上的科学虛構<sup>①</sup>”。對於語言社會性的这种严重的曲解，是与混淆語言的等同現象和語言的同一形式這兩個概念緊密联系着的。从某个社会的个别代表者的言語中缺乏完全一律的事實出發，並且在一般哲學的錯誤概念的基礎上，做出了關於社會統一語言的不存在、關於統一語言的“杜撰的”錯誤結論。

但是，在严格区分語言的等同現象和同一形式的同時，必須也注意到：等同現象依然也必須有某種程度的，至少是相對的同一形式，因為在語言的各種變形之間沒有一定程度的近似，也就不可能在統一的、不可分割的交际網中利用它們作為這種交际的主要工具。同時，交际自身也創造和支持語言，必要的相對同一形式，尽可能使這種相對的同一形式適應於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那些交际关系。但是因為交际中的變化往往發生得較快，而語言的結構、語言的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所形成的語言基礎則變化得較慢，那末語言的同一

① A. A. 沙赫馬托夫：《現代俄羅斯文學語言大綱》，1941，第4版，第59頁。

形式的程度时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过去存在过的規定交际的那些历史条件(例如,比較:反映从前社会封建割据,甚至在封建主义过渡到資本主义之后之長时期內保存方言差別的情况)。

12. 很显然,交际不只是在同一代人之間进行的,而且也是在不同几代人之間进行的,因此同样一种語言才能一代代地遞傳下去。如果这样遞傳繼續下去,我們就有某种語言的傳統以及在許多时期之內該种語言的历史等同現象(即使在該种語言历史發展的过程中發生种种变化)。十分明白,既然如此,一个时代的語言归根到底可以与另一个时代的語言不同,不同的程度可能比甲方言与戊方言之間那样的差別大得多,因为在一个时代的語言和另一时代的語言之間的中間“环节”可能比所說的甲方言与戊方言之間的中間环节多得多,因为在甲方言和戊方言之間假設只有乙方言,丙方言和丁方言的环节,所以相距最远的方言的分歧是有限的(要知道,一切相鄰的方言都参加方言間的交际)。

可是,比較晚近时代的語言与比較久远时代的語言不論相距如何的远,只要它是每兩個相接鄰的兩代人交际用的一种語言,就是說,它的傳統尚未中斷,那末它在从一个时代到下一时代的整個發展过程中依然还是同样一种語言。由此可見,就是在一个时代的語言与相距已远的一个时代的語言之間差別縱使很大,也可能存在語言的历史等同現象。例如,現代英語与古代英語的差別虽然不減於与現代德語的差別,但是它在历史上依然是与9至10世紀的盎格罗撒克遜时代的語言那样的同一語言,它与9至10世紀盎格罗撒克遜时代的語言是用相繼不断的一条綫索联系着的;在这一千年整個發展的途程中並未有“爆發”,也未有过一种語言代替另一种語言的事情<sup>①</sup>。

由此可見,語言的历史的等同現象基本上与个别語言事实的历

---

① 法語暫時虽把英語从某些使用範圍排斥出去,但沒有破坏英語的整個傳統,英語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依然是英国人民的語言。

史等同現象一样，是受同样原因决定的，關於这点，上面已經說过了。但是在这里还須要注意到差別的地方。

語言是一种極复杂的体系，它与任何个别的語言事实的差別，就在於此。在語言由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历史發展过程中，不仅是它所含的單位(詞及其他)發生变化，而語言組成自身也更新了：一批批新的單位进到語言中，而其他一些單位則逐漸消失。由此可見，語言的历史等同現象決不是要有这样的先决条件，即語言体系的一切个别組成部分(單位)在其某一發展阶段中与它过去一个阶段中相应的各單位都是历史上等同的，也不会在它將来的一个阶段中这样相应的單位都是等同的。任何的历史大厦在其恢复的过程中，都可以發生很大的材料更新現象，甚至發生建筑方面的变化；但是只要新建筑材料和建筑的新特点，每次都是增进到这个大厦的先前結構中，增进到已經存在的大厦上面，而不是在新的地址上重新組合起来的，那末从历史上說，这个大厦依然是同样一个大厦。同样，对語言的等同現象來說，重要的是它的某种体系的傳統，而不是这个体系的个别組成部分和特点的傳統。

13. 如同語言的个别單位的兩個历史等同現象可能形成兩個語言單位(參看上文第8节)的同一起源的現象那样，在自身存在历史等同現象的兩種語言的情況下，這兩種語言也可能有同一起源的情形，这也就是它們的親屬关系。所以，親屬語言就是同一起源的語言，亦即自身始終存在历史等同关系的这样一些語言，它們在过去也是彼此等同的。这也就是“起源於同一种語言”。

語言的親屬关系既然是它們的同一起源，既然它們有起源於同一种語言的这个历史事实，那末無論其中每种語言發展任何变化，只要这时它自身存在的等同現象沒有停止，語言的親屬关系就沒有消失，而且語言的親屬关系也並不一定是需要与其他親屬語言具有任何一定程度相似。例如，現代冰島語言与現代大陸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語言相差的程度，較之斯堪的納維亞諸語言之間彼此的差別大得多，但是冰島語言與它們的親屬关系，也像它們之間彼此的親屬

关系一样。如同出生於某一城市的人 無論他迁移到什么地方去住，依然是这个城市出生的人那样，作为 某种古代語言較晚近的發展阶段的一种語言与起源於这种古代語言的其他一切語言之間依然是有親屬关系的，而且只要一般地它不为任何其他一种語言所排斥，就是說，只要一般地並未停止作为一个重要交际工具的語言来使用，那末無論它随時間的进程如何地变化，与起源於同一語言的一切其他語言依然形成一个語系（語族、語支）。親屬語言之間或大或小的相似，並不是親屬关系的本質，而是親屬关系的必要形式和表現。

總之，一般地从語言等同現象的特点中，特殊地从語言的历史等同現象的特点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

(1) 起源於同一語言（即親屬关系），並不等於說起源於最大限度的同一形式的語言：作为某些親屬語言的發展的开始阶段的这种語言，即基础語言（母語），並不排除它的莫大的多式多样性——直到其中存在互不了解的一些方言（比較第 14 頁關於方言所說的話）；

(2) 某些語言的同一起源（即它們的親屬关系），並不等於說，它們組成和構造的一切單位，都是同一起源的，並不等於說，所有这一切單位都是起源於它們共同的基础語言。在長久的發展时期，每种語言的組成和構造，可能曾大大地（虽然是逐漸地）更新，而沒有破坏其中每种語言的历史等同現象。對於这些情况沒有应有的估計，便不可能正确地理解語言之間的親屬关系，这种情形就会导致親屬关系与基於影响（交配等）的关系的混淆，就会导致依据“相似”去造成“親屬关系”的概念，等等。馬尔在这个問題上的許多錯誤，正是由於对上述情况估計不足而产生的。

14. 語言之間的事實上的相似，可能不是依据它的同一起源，亦即不是依据親屬关系而造成的。語言組成和構造中（如構詞法，句法）的許多相似的和共同的要素，可能是从借用外来語和平行产生的新詞而造成的。这类的相似和共同性，跟親屬关系沒有关系，正如所說过的，親屬关系是不能借助於“匯合”的方法来形成的。正如斯大林指出的，两种語言的交配，並不产生第三种語言。語言的交配並不

致於確立交配的語言或它們所屬的那些語支之間的“親屬關係”。例如，11—12 世紀的英語與同時代的諾爾曼·法蘭西語言交配，並沒有引起英語與法語或日耳曼諸語言與羅曼諸語言之間形成新的“親屬關係”，因為，由於這次交配的結果，並沒有產生任何新的“日耳曼羅曼”語言。英語雖然曾由法語要素大大豐富了，但是依然是屬於日耳曼語族的一種語言。

由此可見，語言之間事實的相似本身，一般說來，還不是語言的親屬關係，因為語言事實的相似並不是它們過去的等同關係，只是它們在某一時期彼此之間或大或小的近似。這樣的近似，就其起源來說，在原則上既可以基於親屬關係，也可以基於它們歷史發展的其他各種情況而形成的。但是這時就弄清楚，基於整個親屬關係的相似要素，與有任何其他根據的相近要素（借用，等等），是有重大區別的。

在關於語言的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的學說中以及關於只是經歷逐漸變化的語言穩固基礎的學說中，上述的差別就得到理論的說明。很自然，某些語言共同的單位，由於這些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大半是屬於這些語言的穩固基礎和它們的結構範圍以內的，因為這些單位一定是從遠古保存下來的（詳情，參看 33 節）。

15. 從以上所說，就可了解：為什麼歷史比較法應用的最重要範圍，正是不同語言中那些共同東西的範圍，而這些共同東西不是基於借用，不是基於交配而是基於它們之間的親屬關係而形成的。在這些共同東西的歷史中，出現了其中每種語言的基礎自身的歷史，即出現了構成該種語言特點的本質的歷史。我們在這裡也正是研究親屬語言中每種語言所圍繞着成長起來的核心。要知道，在語言發展的每個一定時期的基本詞彙，是構成新詞的基礎，借詞也是在基本詞彙的基礎上同化了的。要知道，語法構造在語言整個歷史過程中推進了詞彙的“建築材料”，這樣或那樣地涉及到一切現在的詞，新構成的詞和借詞。語言結構的一切單位，不是單個地而是作為語言整個體系的部分從一代過渡到一代的；只要整個體系不斷地出現於連貫的言

語中，這些單位也就在這個體系里，而且與這個體系分不開的：一句話，這些語言自身，即作為相應社會中每一時刻的兩重要交際工具的整個體系的傳統，正是與這些單位（即親屬語言由於其親屬關係所共有的那些單位）聯繫一起的。但其他的共同單位總是這樣或那樣地相繼出現，加入到共同體系中，並且在共同體系的結構的基礎上作為個別單位而同化了的。

還應該特別指出：研究親屬語言中自古即有的共同單位，不僅從這些具體語言的歷史的觀點說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從普通語言學的观点來說，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像斯拉夫各民族的語言親屬關係，就能在研究語言發展的規律方面，對於語言學有很大的益處。研究語言的親屬關係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普通語言學的价值，就是因為在研究親屬關係的材料時，我們一部分是研究自古即有的共同的（原始的）、同樣事實的不同發展，一部分是研究其相同的發展。因此，在這里就明确提出和解決以下這樣重要問題的有利條件：若干民族（使用這些語言的人）的具體歷史中存在相同的和不同的要素的關係，關於個別語言的平行變化的一般規律及個別語言的差別的一般規律的問題。

其次，大家還知道，某些語言共同的單位是基於這些語言的親屬關係而形成的，它們有些共同的單位是由別種起源而形成的，我們借助於歷史比較法，大半就能十分有把握地把這兩種共同單位區別開來。因此，歷史比較法就使我們能夠闡明和解釋某些語言之間關係的性質，確立（證明）它們之間的親屬關係，或者反之，推翻這樣親屬關係的假設。確立（或推翻）某些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實際上就能幫助我們研究它們，因為確立了親屬關係，就能使鑽研的工作更加有組織，而使鑽研工作具有更加明確的方向。此外，明確某些語言的關係，對於研究有關民族的沒有文獻的歷史來說，也會有很大意義，因為語言發展與有關民族的歷史的緊密聯繫還表現在：語言之中保存着民族之間先前的各種關係的痕跡。從上述一切，就可明白：應用歷史比較法和研究語言之間的真實歷史關係，特別是親屬關係的問題，



是互相紧密联系着的。

## 二

16. 語言組成和構造中的不同單位,特別是語言的語音物質的單位——个别的音(音位),可能是同一起源的單位。例如,斯拉夫語的  $c[s]$  可能是与日耳曼語的  $h$  有同一的起源,因为两个音都可能起源於印欧語言的  $*k'$ 。大家知道,比較語法时常是研究个别語音的同一起源的現象,而这种情形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語音的同一起源現象是独立地、不假外助地建立起来的。

但是單从这种等同現象中去确立这种关系是不可能的,所以为要求确定語音之間的历史对应关系和構拟文字以前它們的發展情况,不可以只比較語音。例如,不能說明斯拉夫語的  $c$  在起源上相当於其他印欧語族的語言中什么音,如果仅仅比較这些語言的語音的話。比較某些語言的語音,甚至比較某些語言的整个語音体系,只可能是描写的比較,就是說,只可能对比其異同,但是这种比較不可能是历史的比較,就是說,不可能是借以能够确立起源的对应关系因而構拟發展的以前阶段的那种比較。

只有在比較有意义的語言單位的情况下,就是說,只有在比較真正的語言單位,即具有外部的(語音的)方面和內部的(意义的)方面的那些兩面俱全的單位的情况下,語音的历史比較才有可能。由此可見,只有通过像詞或詞素这样單位的比較,才能进行語音的历史比較。例如,只有經過对古斯拉夫語  $сръдце$  [心]、俄語的  $сердце$  [心] 和哥特語的  $hairtō$  [心]、德語的  $Herz$  [心] 这类詞的比較,才可能对斯拉夫語的  $c$  和日耳曼語的  $h$  进行历史比較;也只有比較这些完整的意义單位的基础上,才可能确立斯拉夫語的  $c$  和日耳曼語  $h$  的同一起源。同样,印欧語的  $*t$  保存在希臘語和拉丁語的  $t$ 、斯拉夫語的  $T$  以及發展为共同日耳曼語的  $p$ 、英語的  $th$  [e, ð]、德語的  $d$  的規律,也只有在比較下面这样有关的意义單位的基础才能明确,例如在希臘語冠詞  $to, ton, tēn$  等,哥特語  $pata, pan, pō$  等、英語的

the, 德語的 das, den, die 这类形式中的指示詞的語根詞素 \*t-。在这个例子中, 詞素的声音外壳 总共只由一个声音 (\*t > p > d) 組成, 但这並不改变問題的本質。在这里, 作为基础的是詞素的比較, 而不是語音自身的比較。

17. 比較那有意义的語言單位之所以必要, 是由於: 一般說來, 用历史比較法構拟的可能性, 是根据条件性的原則, 或者是根据語音与意义之間的联系的假設性原則。正是在这种联系的假設性情況下, 不同語言的某些單位的語音相似 (确切些說, 語音的类同) 与它們意义的相同或相似的符合, 可以作為这些單位的同一起源和它們真實共同起源的一个重要標誌。在这个条件下, 其他唯一的理論可能性, 就是某种語音类同与意义相同或近似之間的偶然符合。如果完全沒有这种偶然符合, 那末这些語言單位的同一起源, 就会因此毫無疑問地确立起来。因此, 如果确証偶然符合是不可能的, 那末實質上就是語音單位同一起源的一个証明。在声音和意义之間联系的假設性和制限性的条件, 只有語音和意义一起存在的情况, 才能产生; 一般說來, 正是因此, 历史比較法只可直接应用於語言的有意义的單位。

說到語音与意义之間联系的假設性 (条件性) 原則时, 也必須記住: 一般說來, 在語言中發生作用的还有另外一个相反的原則——这类联系的依存性, 論証性原則。只有在这兩個互相对立的原則結合的条件下, 語言才能存在和發展。

語音和意义之間联系的論証性原則, 基本上不是表現在拟声詞和准拟声詞。这些特殊的、个别的例子, 是不值得注意的。一般說來, 關於这类詞所写的东西已很多了。

作為語言的構造和职能中一个基本原則的論証性原則, 是在於其他方面。它是在於: 个别發音的結合, 必須先有与这些語音对应的意义的合理結合, 或者反之: 合理的意义結合, 需要有对应的語音結合。这也就是說, 意义复杂的一段話和复杂語言單位的語音, 是由於在这一段話或在这單位中表現哪些意义, 而在这一段話或这样語言單位的綜合意义中区分出个别組成的意义是由於: 在这一整个單位

的語音中可以区分出哪些有意义的个别語音。

由此可見,假設性(条件性)原則,是应用於簡單的、不可分的或相当孤立的成語單位。但在复杂的單位中則論証性原則也發生作用了——因为复杂的單位中包含簡單單位,当然是同第一个原則同时發生作用的。此外,还应注意:也有各种过渡的,混合的情况存在的可能,所以語音与意义联系的条件性和論証性,只能是相对的。复杂成語單位的任何一个因素,往往限制这个复杂成語單位的結構的論証性,並且可能使它等於零。

18. 一般說来,語音与意义联系的条件性和論証性之間的相互关系,是这样的:詞素必然成为历史比較法主要能够应用的基本單位。要知道,假設性(条件性)原則只有在詞素中才表現得最正常和最充分。

但在大半由两个或几个詞素組成的高級單位中,总是有或多或少的論証性的要素攙杂其間。因此,一般說来,这样的單位就是历史比較法的比較不甚适当的应用对象;实际上,只有在这样單位在其組成中含有个别詞素而且在某种程度含有成語性因素的範圍內,才可能用历史比較法进行研究。

例如,在梵語 *janitā*——希臘語 *genetēr* [祖先] 这类情况中,語音类似和意义相同的符合,可以完全証实 *-jani-* —— *-gene-* (<印欧語 *\*-g'enē-*) 和 *-tā*——*-tēr* (<印欧語 *\*-tē(r)*) 这些相应詞素的同一起源,但是不能整个証实这样單位的自古已有的共同性(就是說,不能証实 *\*g'enetēr* 这个詞已經存在於印欧基础語中)。要知道,在像印欧語 *\*-g'enē-* 和 *\*tē(r)* 这样的詞素的存在(在任何詞中)的情况下, *\*g'enetēr* 一类詞的構成,是完全可以論証的,因此,在各种語言中相应的詞(梵語 *janitā*, 希臘語 *genetēr*), 在这些語言独立存在的时期彼此独立地形成,是完全可能的。在这样情况下,很难判断保存到今天的具体單位中有哪些是自古已有的型式,又有哪些是依照它們的类型新構成的。由此可見,梵語 *janitā* 和希臘語 *genetēr* 的完全符合,並不直接証实,正是其中这个具体的詞屬於基础語中已

經以現成的形式存在的那些詞的範圍之內。恰好相反，我們依據梵語 *pitā*——希臘語 *patēr* [父親]相符合的例子，完全有權利肯定說：在基礎語言中已經存在 \**paté(r)* 這個詞了，因為在這裡看到古代的、各個語言所共同的整個單位的成語性。在這裡個別詞素的結合，並不是可以明確論證的。

19. 很显然，詞素（一般說來，是用歷史比較法依其遠古形式構擬的基本單位），不是孤立地存在於語言中，不是作為個別部分存在的，而只是存在於詞的組成中<sup>①</sup>。因此，在所比較的語言中往往首先尋找對應的詞，而且詞往往是歷史比較法所研究的直接對象。

怎樣去找不同語言中相對應的詞呢？

應該承認一定程度的符合和相似是基本關鍵。這時，外在的意義方面或內在的意義方面，可能在最初引起人們的注意。一般說來，后面的方法——從內在方面到外在方面在歷史比較法的工作第一個階段上，是二者之中比較通常和自然的方法。其中原因在於：

很显然，所比較的語言的語音方面，是或多或少彼此不同的。並且假定，在應用歷史比較法來研究所比較的語言之前，它們之間的語音對應的規律還是不知道。因此，從語音方面出發，是很難在其他語言中找到與某一語言的特定的詞對應的那個詞。例如，我們如要在哥特語中找假定與斯拉夫語 жена（妻）一詞對應的詞（那怕是部分地，在根的詞素方面的對應），而且同時只從外在方面，即從語音出發，那末我們立刻就感到十分困難。因為在哥特語中根本沒有 ж 這個音。所以，縱使有這樣對應的詞，那它也不是以這個音起首的。是以哪個音起首的呢？如果假定我們仍然毫不知道所比較的語言的語音

① 甚至在單詞素的詞中，詞素依然不是孤立地出現的，而是作為詞所含有的單位出現的。在現在舉出的具體例子中，詞素是詞的組成中唯一的積極詞素這個事實，並不改變問題的本質，因為詞素自身依然是與它所形成的那個詞不同的，在詞中這個詞素的單獨性質，則是它的特定形式。—дом— 這個詞素的同一形式，在 дома, дому, домох 和 дом 中的意義是一樣的，但作為一個詞（以它的特定形式）的 дом 比起 —дом— 這個詞素來的含義多些，因為在作為詞素時沒有格的任何意義，而在作為一個詞的形式的 дом 中，則有主格或役格的意義。

規律，那我們就必然是几乎乱猜地去找我們需要的詞，只是借助於語音之間某種程度上一般相似之处作为近似的依据(ж——s, p, d, r...; e——e, i, a...; н——n, m...)。很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方法是不适用的。

反之，寻找与某一个詞語义上相应的那样一个詞，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沒有困难，因为可以首先选择意义十分恰当明确的一些詞。例如，与斯拉夫語 жена 这个詞語义相当的，有兩個哥特語的詞：qinō (妇女)和 (ē)is (妻子)，这是不会引起任何疑問的，而這兩個詞在語根上說彼此直接联系着。

当不同語言的語义相同或十分近似的詞被找到和对比的时候，那时就会产生它們之間語音相互关系的問題了。如果这时弄清楚，在不同語言中語义上相对比的詞的語音方面，存在可以認為是某种程度类似的那种相互关系，那末就可以繼續进行比较：語音的类似与意义一致或近似的符合，就表明这些詞，至少是它的詞根，具有同一起源的可能性。

20. 为了要使我們不仅能够說出同一起源的可能性，而且还能說出同一起源的事实，还需要怎样办呢？

上面已經說過，同一起源的真实性，是由偶然符合的不可能性加以証明的。大家知道，所观察的語音类似是建立在正常的，合規律的語言符合的基础上的，而在这种条件下，偶然符合的可能性，就事实上被排除了。只要我还只是研究沒有形成任何合乎規律地相关的类别的个别單位，那末就不能認為偶然符合的可能性已經被排除了。

偶然符合的例子是十分熟悉的，特別是在亲屬語言的关系上面。例如，俄語在 тяга (牽引力)，тягач (牽引机)中的 тяг 和瑞典語中的 tåg (火車)，英語中的 tug (蒸汽拖船)，就語音方面很相似，在意义上也接近，在这里似乎可以假定也是同一起源的現象，可是，在这里只是偶然的符合。在俄語中的 вопить, вопиять (慟哭)和哥特語中 wōrjan (痛哭)，英語中 weep (哭叫)的例子中，也是这种情形(比較：俄語 глас вопиющего в пустыне [人的声音在荒野中慟哭]——哥

特語的 *stibna wopjandins in auḫidai*)。

由此可見，不同語言單位的語音-語義相似的每一個別例子，只是在相互關係的總體系中，才有一定的比重和意義，而且個別例子是從這種體系的觀點加以分析和評價的。它單獨地、孤立地是沒有任何特定意義的。

只有在對某一例子預先設想地規定的那些對應現象在語音外壳和其他語義相近的詞中也觀察到的時候，我們才能斷定個別語音對應的現象的正規和規律性。由此可見，這些詞組成一定的系列，而其中單個成分是在對比的不同語言的詞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意義時，就有一定程度的語音符合的等同現象。

比方我們假定斯拉夫語中的 *жена* 和哥特語的 *qinō, qēns* 彼此具有起源的聯繫（那怕只是在詞根方面），那末為要證明這個假設，就還必須指出另外一些詞，而在其中如果它們具有語義的統一性，就有同樣的語音相應現象，斯拉夫語的 *ж*——哥特語的 *q* 等。

例如，當我們發現，古斯拉夫語的 *жръновъ*（磨盤），俄語的 *жернов*（磨盤），在語義上與哥特語的 *qairnus* 一致，而同時在這裡又看到斯拉夫語的 *ж*——哥特語 *q*，斯拉夫語的 *н*——哥特語的 *n* 的對應現象，而這種對應現象在斯拉夫語的 *жена*——哥特語的 *qinō, qēns* 中已經看見過的，那末關於這些語義近似的斯拉夫語詞和哥特語詞的親屬關係已經得到很大的証實，因為偶然符合的可能性已經大大減少了。其次，如果我們發現斯拉夫語的 *жив* [活的]——哥特語的 *qius*（陽性單數役格為 *qiwana*）[活的]，而這裡又有斯拉夫語的 *ж*——哥特語的 *q* 的對應現象，那末對所做對比的正確性，就是說，對於語義相近的詞是在其語根方面有起源上的聯繫一點，就實際上完全確認不疑了。

比較學派總是強調說，重要的不是語音的相似，而是它們對應的規則性。而 A. 梅耶為說明這種論點曾選擇像梵語的 *dv-*，希臘語的 *dF-*，亞爾美尼亞語的 *erk-*（比較梵語的 *dva(u)* [二]——亞爾美尼亞語的 *erku* [二]）這樣沒有任何相似之處的例子，並不是偶然的。假

定是彼此對應的音組，在這裡是有亟大的差別。當然，對應規則性的原則，應該認為是亟重要的。但是，儘管對於這個原則予以必要的注意，也不應忽視與這個原則緊密聯繫着的其他亟重要的因素。

21. 所確定的規則的語音對應的現象，應有具體的語音的說明。例如，只是說斯拉夫語的 ж——哥特語的 q 的相似不是在個別例子中遇到而且具有充分的規則性，是不夠的。為了我們能夠承認這種對應現象，能夠在中間看到客觀規律，我們還應該確知：這樣正規的對應現象能夠由於同一原始的音的發展而確是歷史上形成的。只有那樣，我們才可以承認斯拉夫語的 ж——哥特語的 q 的外部的形式對應是斯拉夫語的 ж——哥特語的 q 的真實同一起源的表現。因此，必須適當地注意對待所觀察的對應現象的語音可說明性原則。

當然，沒有人否認這個原則，而且在分析事實時還或多或少一貫地注意到這個原則。但是似乎必須更自覺地對待這個原則，把它提高到一個必要的原則的地位，如果不估計到這個原則，確立的任何對應現象，都應該看作是形式上類似真實的假設。

很顯然，語音可說明性的原則要求所確定對應現象的條件有最大程度的具體化。為了這種具體化，第一，需要用不同語言的材料亟全面地闡明某些對應現象，第二，需要在某一種語言範圍中語音關係的內部規律性的角度來分析這種對應現象。

例如，所舉的斯拉夫語 ж——哥特語的 q 這種對應現象，當用下列事實來補充闡明的時候，就具有歷史上更具體的性質：

(1) 那怕是斯拉夫語的 ж 與希臘語的 b 和 g (+u) 的對應關係（比較斯拉夫語的 жена——哥特語的 qinō, цѣнс——希臘語伯奧提方言 бѣотийский 的 banā, 阿提克方言 аттлч. 的 gunē, 等等）。

(2) 在各斯拉夫語中的 ж: г 的語音交替（如俄語 можешь [你能]——могу [我能] 的類型）。所考察的對應現象，就這樣歸入一定體系和或多或少具體的情況中。因此也指出了對這種對應現象加以語音說明的方法。

例如,在所引的具体例子中,斯拉夫語的 ж (哥特語的 q) 很显然是从 r 發展而来,是由於 r 在上顎元音之前顎化和噤音化的緣故。(古斯拉夫語 жрьновъ, 無疑是从更早的 жьрновъ 变来的,比較俄語的 жернов)。由此可見,斯拉夫語的 ж——哥特語的 q 的对应現象,是起源於更古的对应現象: 斯拉夫語的 r——哥特語的 q。希臘語的 b 表明,哥特語的 q 的唇化,大約在哥特語(以及一般的日耳曼諸語言)中沒有得到發展,而在印欧基础語中則存在过这种唇化現象,而且这从下面一个事实也可以得到証明:就在哥特語中非唇化的 k,也處於同样的情形(比較哥特語的 kinnus [腮], 哥特語的 kisan [選擇], [遭受]——希臘語 geustos)。因此,應該認為斯拉夫語的 r 在这里是起源於唇化的 g<sup>u</sup>, 希臘語的 b (和 g), 也可以从唇化的 g<sup>u</sup> 得到語音上的說明;很显然,就是哥特語的 q 也是可能起源於这个 g<sup>u</sup>, 因为哥特語的 q 与 g<sup>u</sup> 的差別只是在於無声(也許是只在於稍微增大的發音力量)。这时假設的一切語音过程,不但是从普通語音学的观点來說十分自然,而且还有毫無疑問的历史平行現象:比較拉丁語的 g<sup>u</sup> 在法語中發展为 [ʒ] (通过 [dʒ]; 拉丁語 gestus, -um——法語 geste [客人]); 在古英語中 g<sup>u</sup>——現代英語 [dʒ] 中的發展 (古英語 brycg——現代英語的 bridge [橋]);——比較拉丁語 gu, qu 在法語 [g, k] 的發展 (拉丁語 lingua [語言], quis [什麼]——法語的 langue [-g], qui [ki]);——比較日耳曼語的 g 在古代高地德語中的清聲化 (德語 Brücke [橋]——低地德語 Brügge) 和在現代丹麥語的清聲化 (丹麥語 gård, gå 等已不是濁音的 g 而是清聲的 g, 即弱的 k)。

22. 对个别語音变化的分析,應該还从該語言的語音系統發展的比較普通的規律的角度加以闡明,因为观察表明:某些变化关涉到的,时常不是个别的音,而是語音的特定的类型。例如,在所考察的这个例子中,斯拉夫語的 r 的軟化(上顎化和噤音化),是与斯拉夫語的 k 軟化为 ч 形成統一过程; g<sup>u</sup> 之变成斯拉夫語非唇化的 r, 同样是与印欧語的 g<sup>uh</sup> 变成斯拉夫語非唇化的 r (比較拉丁語的 formus, 哥特語的 warms——俄語的 горячий [热的]), 梵語的 gharmah 和



印欧語的  $k^u$  变成斯拉夫語的  $k$  (希臘語  $póteros$ , 方言的  $kóteros$ , 哥特語的  $hvaþur$ ——俄語的  $который$ , 梵語的  $kátarah$  [哪一个]) 的事實結合一起的; 大家知道, 日耳曼語的  $g^u$  的清化為  $k^u$  (= 哥特語的  $q$ ), 是與  $b$  清化為  $p$ ,  $d$  清化為  $t$  同樣的輔音轉換的同一“動作”; 在希臘語中  $g^u > b$  這個例子中唇化增加到雙唇完全閉合, 與  $g^{uh}$  發展為  $ph$  (是與送氣發音聯系一起的清聲化) 和  $k^u$  發展為  $p$  是完全一樣的; 同樣, 在梵語中  $g^u$  變為非唇化的  $g$  (在軟化為  $j$  的情況下), 是與  $k^u$  變為非唇化的  $k$  (在軟化為  $c[\check{c}]$  的情況下), 和  $g^{uh}$  變為  $gh$  ( $h$  也是由此而來), 都是完全同樣的情形<sup>①</sup>。

由此可見, 當所觀察的規則的語音對應現象從語音學的观点加以滿意的說明, 並且因而作為具體歷史發展的結果來理解的時候, 那末就可以有充分理由肯定說: 我們看到了所對比的不同語言中單位的同一起源。因此, 若把語音對應現象的研究, 與構擬這些語言單位(詞素、詞)分開來, 在原則上是不對的——例如, A. 梅耶雖然在實際上很少去構擬原始單位, 但是他在理論上彷彿是傾向於這種分割的。

規則性的適應現象, 是構擬某些語言單位所依據的基礎, 但是反過來說——這樣單位的構擬為普通語音學資料和個別語言的語音規律所証實時, 就可以用來作為這種對應現象的必要說明, 並且還可以用來補充証明這些對應現象不是異常偶然性的符合, 而是根據內部發展規律的現象。就如同不應把音位學歸結為關於語音對比和相互關係的學說那樣, 也不應把歷史比較語音學變成關於“對應現象”的形式主義的學說。在完全具體和真實歷史運動中的語音物質, 要求我們予以更大的注意。

23. 既然用對不同語言中在意義方面可以直接對比的詞進行歷史比較分析, 並且這些語言之間語音對應現象的規律逐漸加多地弄清楚, 那末根據已經知道的語音對應關係對詞進行對比, 就開始在以

① 很显然, 關於所有這些過程的個別例子和關於它們的方言限制和變形, 沒有細說的必要。

后的研究过程中起着日益增大的作用。比方說，如果我們假設斯拉夫語的 жена 和哥特語的 qinō 兩個詞的對比，是根據詞義進行的，那末在尋求像斯拉夫語 жив (ъ)——哥特語的 qius，古斯拉夫語 жрьновъ，俄語的 жернов——哥特語的 qairnus 這樣一些平行現象，那末除去語義以外，就已經預先估計到某些語音的因素：斯拉夫語的 ж——哥特語的 q，斯拉夫語的 н——哥特語的 n 的對應關係。但當語音對應關係已經充分地確立起來，那末，一般說來，這些對應關係就成為對比所研究的一些語言中某些詞、尋求進一步的詞源的平行現象所應用的基本條件。因而就創立了語義較遠的詞接近的可能。同時，所觀察的詞義相互關係，特別是語義分歧的語義學的說明問題，也就產生了。

正如我們知道的，一般說來，詞可能經歷很重要的意義上的變化；可以比較古英語 sæd [飽的] 發展到現代英語 sad [憂愁的] 的情形。因此，很顯然，可以假定在不同語言中同一起源的個別單位決沒有相符合的意義，而且在原則上一定程度的語義分歧也不能夠阻礙我們承認某些單位的同一起源。但很顯然，這樣的分歧應該是根據語義學加以令人滿意的說明的，正如同某些不同的語音的對應現象應該從語音的觀點得到具體說明那樣。由此可見，除了語音的可說明性這一原則之外，還必須注意所對比的單位之間觀察得到的相互關係的語義學的可說明性原則。

由此可見，依據語義直接加以對比的一些詞（例如：斯拉夫語的 жена——哥特語的 qinō，根據“婦女”的詞義的對比），進一步可以從它們之間或它們個別詞素之間的語音相互關係方面加以研究；但是，依據已經弄清楚的語音對應而接近的那些詞，應該從語義上相互關係的角度來加以分析。例如，斯拉夫語、希臘語、拉丁語的 d——日耳曼語的 t (> 德語的 z [ts])，斯拉夫語、希臘語、拉丁語的 o——日耳曼語的 a，斯拉夫語、希臘語、拉丁語的 e——日耳曼語的 e 或 i (依特定的條件而有不同)，斯拉夫語、希臘語、拉丁語的 m——日耳曼語的 m 這些已經肯定的語音對應現象，就使我們能夠提出這樣一個

問題，即斯拉夫語的 дом(ъ)，希臘語的 dómos，拉丁語的 domus [家]、拉丁語的 domāre [馴养]，希臘語的 démein [建筑] 和哥特語的 gatamjan [馴养]、古英語的 tam [馴的，家庭的] (>現代英語 tame，比較德語的 zahm)，哥特語的 timrjan [建筑]，timrja [木匠]、英語的 timber [木材] (比較德語的 zimmer [房間、木材]、zimmerman [木匠]) 這些詞中詞根是有同一的起源。但是為了要有把握地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分析“家”、“馴养”和“馴服的”這些詞的意義之間的關係(斯拉夫語的 дом(ъ)、希臘語的 dómos，拉丁語的 domus——domāre，哥特語的 ga-tamjan——古英語的 tam)；就必須分析“建筑”、“木匠”和“木材”這些詞之間的意義上的關係(希臘語 démein，哥特語的 timrjan——timrja——英語的 timber)；其次，還要注意到印歐基礎語言中 e:o 兩個元音有規律的交替——“建筑”和“家”之間的關係(希臘語的 démein 等詞——希臘語的 dómos 等詞)。並比較古斯拉夫語的 доухъ (從 \*dhous- 而來)和哥特語的 dius (從 \*dheus- 而來) [野獸、動物] (英語的 deer [鹿<野獸]，德語的 tier [動物]，其中  $r < z < s$ )；俄語的 сыр (ой) [潮濕] (<\*sūr-) 和古英語，古代高地德語 sūr [酸澀] (現代英語 sour，現代高地德語的 sauer)；俄語的 сам (ый) [自己] (<\*sōm-) 和古冰島語的 sōm [榮譽]。在不同的具體例子中，語義的關係之明顯程度可能不同，或者相反，其混亂不清的程度可能不同；但是，當沒有十分直接的符合的情況的時候，甚至像古斯拉夫語 жена [婦女，妻子]——哥特語 qinō [婦女] 的符合情形也沒有的時候，那末語意的分析始終是必要的。

24. 大家知道，語義學研究的精細程度，比起語言學其他部門差得很遠，比起語音學相差尤大。因此，對所比較的單位的必要的語義學分析，直到今天往往還是或多或少地“手工業式地”進行的，時常只以“健康的意義”為依據。很顯然，用歷史比較法所達成的效果的可靠性就因而減低了。因而語義學嚴格的科學研究依然是使這個方法完善的極重要條件之一。

語義學分析不應該變成對於各種概念自身的相互關係的抽象議

論，而絲毫不去估計這些相互關係的語言表達。必須使這種分析成為語言學的分析。為要做到這點，始終應該注意，語義聯繫雖然是首先決定於所表示的對象，現象等自身的真實相互關係，但是依然是根據它們是否客觀化以及是否通過語言的語音物質區分出來而有不同的表現。因此，不可以只是抽象理論地論斷。例如，*дух*（精神）和 *зверь*（野獸）的詞義是否彼此之間有一般的聯繫，以及論斷它們能否由於這種聯繫而用同一個詞根表達出來。一般說來，只要是 *зверь* 理解為“有生命的”東西（比較 *животное* [動物] 和 *живот* [生命]），那末這兩個詞的意義就“可以”是有聯繫的。但是因為在俄語中，這樣可能的而相當疏遠的聯繫並沒有在 *дух* 和 *зверь* 二詞的意義中指出來，表示出來，又因為由於這種聯繫的疏遠，往往不注意這種聯繫，可能沒有估計到它：俄語並沒有表明這種聯繫的存在。在民間拉丁語中的情形就不同了：在這裡 *animus*（精神）和 *animal*（野獸，動物）在語音上相近，因而這種情形就使人們注意去尋求這些對象中的共同因素；如果這樣共同因素能夠找得出來，那末共同因素就被覺察得到，就是說，積極的語義聯繫就建立起來了。

民間拉丁語中的情形表明，一般說來，“精神”和“動物，野獸”兩個詞義之間相互關係是這樣的。在文化發展的某個階段中，相應的詞之間的語義聯繫可能表現出來，因而巩固和特別標明出來。因此，應該認為，印歐語的 \**dhous*（古斯拉夫語的 *доухъ* 一詞即由此而來）和印歐語的 \**dheus*（哥特語的 *dius* 等詞即由此而來），由於其語音相同，一定引起人們注意它們的共同因素，就是說，它們應該不是以偶然相似的單位出現的，而是以有意義的顯然類似的單位出現的。因為在這類單位中 *e*——*o* 的區別，是一個普遍現象，所以這種區別就是以語音交替的形式而出現的，同時，這樣單位自身則是以同樣一個作為詞根的詞素的不同形式。因此，我們有理由肯定說，古斯拉夫的 *доухъ*，俄語的 *дух* 和哥特語的 *dius*，德語的 *tier*，英語的 *deer*，是以詞根的同一起源彼此聯繫着的，它們之間規則的語音對應現象不是偶然的符合，而反映出其同一起源。

在語義分析過程中估計到語言的外部語音方面在語義聯繫方面所起作用的時候，也必須經常注意到確定這些聯繫或阻礙確定這些聯繫的那些真實的生活條件。如同在從語音觀點分析語音對應現象時必須估計到某一語言發展的語音特點那樣，在進行語義的分析時，也同樣必須注意在相應社會的特定歷史時代某一語言共同體系中某些語言現象發展的具体歷史條件。一般說來，語義發展過程，本來是與社會歷史發展的具体因素緊密聯繫着，因為語言是與生產活動和人的任何其他活動直接聯繫着的<sup>①</sup>。

25. 在確定詞的語義關係的時候，必須嚴格地估計到詞的詞彙形態(構詞)的結構。例如，不可以只斷定說，希臘語 *démein* 和哥特語的 *timrjan* 在“建築”這個意義上彼此符合。還必須說明，在希臘語中沒有對應的構詞要素 *-rj-* 在哥特語中起着怎樣的的作用。為了這個目的，必須仔細分析哥特語的 *timrjan*，古英語的 *timbran* [建築]，哥特語的 *timrja* [木匠]，*timreins* [建築，名詞]，古英語的 *timber* (古冰島語 *timbr*，等) [木材] 以及其他這類構詞之間的一切詞彙-形態(構詞)的關係。此外，當然還必須明確語法構形中超出某些具體詞的構造特點範圍以外的那些一般區別(例如：希臘語的 *-ein* 和哥特語的 *-an* 在材料上沒有對應，依然不能形成希臘語的 *démein* 和哥特語的 *timrján* 之間的特殊區別，因為它們是屬於一定類型的動詞不定式，並且是一般地說明動詞不定式的構成，而不是說明某些具體詞的構成)。

詞彙-形態關係的分析，在原則上不應只限於像這裡所舉的在形態學組成中這樣明顯分歧的例子(希臘語的 *démein*——哥特語的 *timrjan*)。嚴格說來，一切所對比的詞，詞義符合的詞以及詞義分歧的詞，都應該加以這樣的分析。同時還要弄清楚，問題是不是跟自古已有的等同的詞彙-形態的構造有關係，所觀察的詞義區別與這種構造方面的區別(例如：在希臘語的 *démein*——古英語 *timber* 這個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7—8頁。

例子中)是不是有联系,或者这种区别在同样的構造中是不是也存在(比較俄語的 сыр (ой)——古英語的 sūr [酸])。这样的分析表現在許多例子中,初看起来彼此完全对应的詞,在某些方面是有分歧的,而且这种分歧需要加以解釋。例如,上面所引的斯拉夫語的 жена——哥特語的 qinō 二詞的对应現象,發現並不是完全对应的。斯拉夫語的这个詞有帶 -ā- 的印欧語詞干 (\*g<sup>u</sup>enā-),而哥特語則有帶 -ōn- 的詞干(在印欧基础語中,可能是 \*g<sup>u</sup>enōn-)①。这种相互关系,在原則上与希臘語的 démein——哥特語的 timrjan 的相互关系的区别,只是在於后者的例子中,我們注意的是 -r- 和 -j- 兩個詞素的应用,這兩個詞素比較显然突出地用作構詞的后綴,而 ōn 这个要素普遍用作更加形式的“構成詞干”的要素,自身沒有十分明显的意义:用 ōn 構成的詞与 -on-, -ēn- 交替,而特別是在日耳曼諸語言中,时常遇到用 on 構成的詞作为其他構詞的平行形式,它們显然与这些其他構詞形式沒有意义的差别;比較从印欧語的 \*lubh-ā- 和 lubh-ōn- [爱情] 而来的古英語的 lufu 和 lufe (間接格 lufan);分別从印欧語的 \*dng<sup>h</sup>hwā- 和 \*dng<sup>h</sup>hwōn [舌头] 而来的拉丁語 lingua < dingua 和哥特語的 tuggō (tuggōn)-, 古英語的 tunge (間接格 tungan); 古斯拉夫語的 oyxō (< \*ousō) 和哥特語的 ausō (复数的主格和对格为 ausōna) [耳朵]; 拉丁語的 cor (cord-) 和哥特語的 haitō (复数主格和对格为 haitōna) [心臟]等②。虽然,由於这样平行的例子很多,像在斯拉夫語 жена——哥特語 qinō 这类例子中,詞根对应的情形不会引起任何的怀疑,而每种这样个别例子可以不加以單獨的分析,但是估計實質上的詞彙-形态相互关系,就是这里也是必要的:例如,要知道肯定關於与其他構詞形式的平行和語义

① 可能在日耳曼諸語言的許多这样的詞,已經在这些語言中产生了,就是說,它們不是起源於共同印欧語時代的。

② 應該指出:除去这样“形式地”用 -ōn- (-on-/-en-/-ēn) 只作为“構成詞干的要素”以外,还知道用它作为明显的后綴,例如用作动作者的名称;比較哥特語 timrja [木匠] (复数主格为 timrjan-s < \*-on-es)。

相同的而用 -on- 構詞形式的存在这一点,只是用詞彙-形态分析,才有可能,如果不进行这样分析,任何語义学的結論是不能令人完全信服的。

26. 如从上面的敘述(第 16—20 节)可以看到的那样,历史比較法的应用,不可避免地时常遇到这种情况,必須对所比較的語言中每种語言的事实个别地进行語音-形态分析。这种必要性是決定於下述兩点的:

(1) 在同样一种語言中,我們往往看到不同的音与其他語言的同样一个詞对应的情形。例如,比較古斯拉夫語中 к 和 ч,希臘語中 p 和 t 与拉丁語的 qu、哥特語 hv 对应<sup>①</sup>;例如在詢問詞的詞根中:古斯拉夫語的 кѣто, кого, кѣдѣ, которым 和 чѣто, чесо, чего, чини;希臘語的 póteros [二者之中“哪一个”], pou [哪里] 和 tís [誰], tí [什么];拉丁語的 qualis [怎樣的], quantum [若干], quum [> 古典形式的 cum] [什麼時候], quod [什么], quis [誰]; quid [什么], 哥特語的 hvan [什麼時候], hvaþar [二者之中“哪一个”], hvas [誰], hvis [誰, 生格], hvileiks [怎樣的]等。

(2) 詞彙-形态分析(沒有这种分析,不可能进行詞的精确的比較)需要估計到詞素的語音变形。例如,沒有先确定在 вытекать 和 точить ([流注]:比較 крово-точить [流血], точить слёзы [流淚]) 兩個詞的語音差別中出現同样一个詞素的变形,就不可以肯定說,在这兩個詞中有同样一个詞根。但为要做到这点,就需要确定这样的差別在俄語的構造中佔居怎樣的地位。

既然有这样一些情况,就必須分析这样一个問題,既關於某些語音差別是不是反映在基础語言中已經存在的比較远古的語音差別的問題,或者是關於它們是不是由於某些条件而分化才产生的問題。例如,比較古斯拉夫語、希臘語、民間拉丁語和哥特語中的詢問詞,需要弄清楚这样的問題:在古斯拉夫語 к 和 ч 之間或希臘語 p 和 t 之間

① 拉丁語的 qu 和哥特語的 hv, 各被描寫成一個音:唇化的 k 和唇化的 h。在哥特文字中,用 hv 所代表的音,是用類似 θ 或⊙的一個字母表示的。

的差別，与拉丁語 qu 和哥特語 kv 对应的情况下，是不是在民間拉丁語和哥特語后来的發展中相符合的各音之間的远古差別的反映，或者是斯拉夫語和希臘語中某些音是由於产生出拉丁語 qu 和哥特語 kv 的同样一个印欧語語音不同發展而产生的。研究某一个別語言中某些語音配合的規律，就使我們能够檢查和確証專用历史比較法得到的某些材料，有时还能使我們拋棄一些錯誤的假設。

27. 語音-形态分析的基本原則，就是在各种詞中某些語音事实和形态要素的語義联系之間寻求平行現象的原則，正是因此，这种分析才說是語音形态分析。例如：

語 音 事 实： к—ч	語 義 联 系：
текут—течет пснут—печет	詞彙意义的等同 同 上
вытекать—точить покой—почить кому—чему кому—чей	語義中的共同要素： “液体的流动” “不动，安靜” } “詢問性質”

这样的平行現象表明，在对应的例子中語音的某种差別（在所引的例子中：к—ч）分化的，不是不同的詞素，而只是同样一些詞素的变形。由此可見，这样差別是語音的交替，因为語音的交替，从这个詞的广义來說，不过是在同样一些詞素的变形之間存在有一定程度上的合乎規律的語音差別。正是对語音交替的研究，一方面使我們能够找出較多的構詞联系，因而加深和扩大对某些詞素的知識；另一方面，使我們能够做出關於交替的語音之間差別原因的某些結論。在这里特別重要的，就是着重指出：这些結論可以不管用历史比較法得出的材料如何，能够用語音-形态的分析而得出的。应用彼此不相依賴的方法得到的一致結果，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證这些結果的可靠性。



例如，用历史比較法得到这样一个結論：与希臘語的  $b$  和  $g (+u)$ ，哥特語的  $q$  等对应的斯拉夫語的  $\text{ж}$  是由於起源於印歐語的  $g^u$  的  $r$  軟化而形成的，同時我們還在個別斯拉夫語言中看到  $r:\text{ж}$  的交替；而且在研究這種交替時，我們就得到這樣結論： $\text{ж}$  是從  $r$  發展而來的。我們可以根据交替音的配合的一般性做出這樣的結論： $\text{ж}$  大半是在顎化的元音(和  $j$ ) 之前，而  $r$  則在其他的情況之下；因此，很自然把  $\text{ж}$  解釋成是在顎化元音(和顎化輔音  $j$ ) 的影響之下從  $r$  發展出來的；比較古斯拉夫語的  $\text{жъреть}^{\text{①}}$  [狼吞虎嚥，第三身] 和  $\text{грьло}$  [取隘，過去時中性]；再比較一下  $\text{жена}$  [妻子] 一詞，該詞中的  $\text{ж}$  也是在前元音之前的。我們在  $\text{ж}—\text{ч}$  這方面還看到完全類同的配合，這種情形就使我們能夠做出各斯拉夫語言中  $\text{ч}$  從  $\text{ж}$  發展而來的這樣結論，即  $\text{ч}$  是由於  $\text{ж}$  在顎化元音(和  $j$ ) 之前軟化的結果而由  $\text{ж}$  發展而來的；比較上面從古斯拉夫語和俄語中所引的例子。

28. 確定語音交替的條件，就使我們能夠構擬某些形態要素發展的比較遠古的階段。例如，既然弄清楚：斯拉夫語的  $\text{ж}$  在與  $r$  交替時，是由於  $\text{ж}$  在一定條件下軟化而從  $r$  發展而來的，那末就可以為古斯拉夫語的  $-\text{жър}-$  構擬比較遠古的階段的  $*-\text{гъr}-(-\text{gъr}-)$ 。因此，可以把“語音-形態分析法”說成是與歷史比較法同時存在的另外一種構擬方式。這兩個方法的基本區別是，在用歷史比較法時，是比較不同語言的事實，而在用“語音-形態分析法”時，則是对比一種語言範圍內的事實(因此，一般人就說這是“內部的”構擬)。還有其他一些區別也是和這種不同聯繫着的，而這些區別需要專對這個問題的特殊研究。在這裡只要指出下面一點就夠了，即在某些方面語音-形態分析是歷史比較法的一個重要的補充，當然，語音-形態分析可以與歷史比較法結合起來。

在某些例子中，還看到有交替時語音配合的基本規律的一些例外。例如，在俄語中  $\text{кто}$  與  $\text{что}$  二詞中  $\text{ж}$  與  $\text{ч}$  是處於同樣的條件下，

①  $b$  這個字母最初是表示不同程度的舌背抬高的顎化元音(寬的  $i$  音?)。

特別是在这里  $\eta$  后沒有顎化的元音。抽象地來論斷，在這類例子中可以假定音的配合或是依照類比法（比較  $\text{кто} : \text{кому} = \text{что} : \text{чему}$  等），或者是比較久遠的條件的變化，就是說，交替所由決定的那種區別已經消逝。在這個具體例子中，我們見到的正是後一種情形： $\text{кто} < \text{къто}$ ，而  $\text{что} < \text{чьто}$ （比較古斯拉夫語的  $\text{къто}$ ， $\text{чьто}$ ）。由此可見，所觀察的基本交替規律的某些例外，可以指明條件已經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因而這種變化也能幫助構擬比較古遠的發展階段。例如，比較  $\text{гореть}$  [燃燒] 和  $\text{жар}$  [熱]<sup>①</sup> 兩個詞，就使我們想到它們具有共同的根，因為一般說來，我們知道，在各斯拉夫語言中  $\text{r}$  與  $\text{ж}$  是交替的，而在这里，無疑地也有語義的聯繫；但是在这里， $\text{ж}$  並不是處於像我們所期待的它是由  $\text{r}$  發展而來的那種情況（要知道， $\text{a}$  並不是顎化的元音；比較  $\text{гарь}$  [焦味] 一詞，其中在  $\text{a}$  之前的  $\text{r}$  依然是保存不變）。在这里，不可能假設這是依照任何類比而構成的，但是可以假設：在这里  $\text{a}$  是從顎化元音（輔音  $\text{r}$  就在它前面發生了軟化）發展而來的。對於有關這個問題的一切材料的分析表明： $\text{жар}$  中的  $\text{a}$  確是從  $\text{e}$  發展而來的，就是說，從顎化元音而來的，而顎化元音引起軟化之後，就在前面的軟輔音影響之下變成  $\text{a}$  了（ $\text{ж}$  由於軟化的結果，起初也是一個軟輔音）。由此可見，以  $*\text{-rēp-}$  ( $*\text{-gēr-}$ ) 的形式——區別於  $\text{гарь}$  中古老的  $\text{-gar-}$  ( $\text{-gar-}$ )——構擬了  $\text{-жар-}$  的比較遠古的階段，因而我們在這個詞素（及其各種變形）中除去元音  $\text{o} : \text{a}$  ( $\text{гореть} - \text{гарь}$ ) 的交替外，還看到  $\text{o} : \text{ē}$  和  $\text{a} : \text{ē}$  的交替 ( $\text{гореть} - \text{жар}$ ,  $\text{гар} - \text{жар}$ ：要知道  $\text{-жар-}$  是從  $*\text{-rēp-}$  發展而來的)。

29. 語音-形態分析幫助我們明確：像在各斯拉夫語言中交替的  $\text{r}$  和  $\text{ж}$ ， $\text{к}$  和  $\text{ч}$  之間或者在希臘語中交替的  $\text{b}$ ,  $\text{d}$  和  $\text{g}$ ,  $\text{p}$ ,  $\text{t}$  和  $\text{k}$  之間這樣區別（特別是，請比較含有詢問語根的詞），不是各印歐語自古已有的區別，就是說，不是起源於印歐語的基礎語言的：這些區別是在個別語言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在所舉例子中即共同斯拉夫語言、希臘語

① 在这里斯拉夫語的  $\text{r}$ （以及由  $\text{r}$  發展而來的  $\text{ж}$ ）起源於印歐語  $\text{g}^{\text{uh}}$ 。

發展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例如我們有把握地把印欧語的詢問詞根,只構拟为 $*-k^a$ 的形式,(拉丁語的 $-qu-$ ,哥特語的 $-hv-$ 就是从 $*-k^a-$ 而来的)而不構拟为与斯拉夫語的 $-k-$ 和 $-q-$ 或希臘語的 $-p-$ 和 $-t-$ 对应的兩種變形的形式(參看前面所舉的例子)。

但是在某些例子中,語音-形態分析幫助我們明確另外一種現象。即在交替的音之間所看到的區別,不是完全用個別語言的历史可以說明的,而這些區別在某種形式上是起源於基礎語言的。比方,如果在  $\text{вытекать}—\text{точить}$  中的  $k—q$  的區別是與共同斯拉夫語(或斯拉夫語族)的形成同時產生的區別,那末在  $—\text{тек}—\text{точ}—$  中的元音是根本不在各斯拉夫語的历史範圍中來加以說明的。在個別斯拉夫語言中的變化,可以說明這個詞素的各種變形中元音的某些具體相互關係,但是區別事實本身以其特定的原始形態(在這裡是以  $e—o$  的形態),是作為說明印欧基礎語言的現象而出現的。為要說明這種事實,必須對原有的該語言自身進行語音-形態分析。無論這種分析提供出什麼材料,但是,重要的一點依然是,從有歷史記載的語言中把這些語言後來發展的交替現象與說明有關基礎語言的“舊有的”交替現象區分出來。

30. 無論對某種具體語言中語音交替的某些事實進行歷史說明問題怎樣,我們始終必須注意,對於某些交替語音彼此以獨立詞素的关系而出現的那個時期來說,這些語音的交替乃是一個形態的現象。正是在存在這樣交替現象的情形下,才應該說到同樣一些詞素的變形。但是在詞素的語音組成中有語音上所制約的變形時,當彼此有區別的語音是同樣一個詞素的位置不同的形式,或者是某一個詞素和代替它的同義詞素,那末嚴格說來,我們看到的不是詞素自身的變形,而只是有關詞素在語音外壳方面的個別要素的合乎語音規律的物質的和功能上的變形。

例如,在  $\text{смотреть}$  (帶清化的  $p$ ) 和在  $\text{смотреть}$  (帶通常的响音  $p$ ) 中的  $—\text{смотреть}—$ ,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詞素的兩個變形:在這裡發音上的差別歸結為同一個音位  $p [r]$  的兩個變形的差別,而且在這裡並沒

有形态交替。反之，在  $\text{смотре́ю}$  中，我們就会看到  $-\text{смотре}-$  这个詞素的另外一个变形，但並不是因为这里  $o$  讀为  $a$ ，而是因为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硬  $p$ ，而是軟  $p$  了： $[p]$  和  $[p']$  在俄語中是彼此不同的音位，这时处于非重讀地位的  $a$ ，對於  $o$ （在重讀时）來說，並不是一個單獨的音位（它不是与非重讀的  $o$  对立的），而只是  $[o]$  这个音位的等同音位<sup>①</sup>。

某些詞素既然具有变形的性質，那末严格說來，所謂詞素自身，在这种情形下，應該理解為它的变形的統一體，或者是变形中它可以用以代表的任何一个变形。例如，我們說到印欧語的詞素  $*-g^uen-$  的时候，严格說來，如果我們不是指几个个别变形（ $*-g^uen-$ ， $*-g^un-$ ， $*-g^uēn-$  等）的話，那只是取該詞素的一个变形作为它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对几个变形中任何一个，往往理解为这些变形的統一體，这种統一體大約可用下列的公式表示： $-g^u\left(\frac{\check{o}}{\bar{o}}\right)n-$ ；比較斯拉夫語的  $\text{жена}$ ，哥特語的  $qinō$ （ $<*-g^uen-$ ）——梵語  $-jāni-$ ，哥特語  $qēns$ （ $<*-g^uēn-$ ）——梵語  $gnā-$ （ $<*-g^un-$ ），希臘語  $gunē$ ，古冰島語  $kona$ （ $<*-gun-$ ， $<*-g^un-$ ）。如果重要的正是把一個詞素的个别变形区分出來的話，那末像  $*-g^uen-$  或  $*-g^uēn-$  這樣的單位，严格說來，就不應該稱為詞素了。這種情況下，正應該把它們列為詞素的变形了。

严格說來，直接構擬的只是一定的詞素变形，而詞素本身則是根據對个别变形的对比和彷彿是把个别变形兼容一起。同时，既然研究了區別个别变形的那些交替規律，那末詞素本身就能整個地構擬出來，那怕不是這些詞素的一切可能的变形都毫無疑問地發現出來呢。例如， $*g^u\left(\frac{\check{o}}{\bar{o}}\right)n-$  這個詞素以這樣形式重擬出來，那末該詞素的帶  $\check{o}$  的变形縱然不知道，也是完全可以証實的。這類变形是可能

① 所謂等同音位（эквивалент фонемы），就是在一定条件的影响下代替某一音位的那个音，但是不可以認為这个音是該音位的一个变形，因为沒有理由說这个音正是同該音位是等同的：要知道，例如不重讀的  $a$  不但代替  $[o]$  这个音位，而且也代替  $[a]$  这个音位。

的，因为在印欧語中  $\check{e}$  一般都是与  $\check{o}$  交替的。

正如已經指出的，詞素的變形性質，引起關於有关的交替的原因或条件問題。

但是这样的原則或条件，並不是在用某种材料和在研究該項材料的某一阶段，始終都能發現出来的。

在这样情况下，在获得某些可靠的結果之前，把所觀察的詞素變形性質看作历史上形成的現象，比起不顧一切地拚命把各个變形都上溯於一个原始的單位來說正確些。这一点對於根据印欧語中元音交替 (ablaut) 的詞素變形性質特別适用，在問題涉及到質的交替 ( $e:o$ ,  $a:o$ ,  $o:o$ ) 时，尤其是如此。

### 三

31. 詞素(在其各种變形中)是用历史比較法構拟的基本單位，不應該把这一点看成这样，即一般說来，只有个别詞素才是能被構拟的。

已經說過，合成詞如果在其構造中有一定程度的“成語性”，那末也是能够深信不疑地整个構拟的。例如，印欧語的  $*patēr$  [父亲]， $*mātēr$  [母亲]等詞(希臘語的  $patēr$ ,  $mētēr$ ；拉丁語的  $pater$ ,  $māter$  等)，無疑地是历史上形成的詞素結合，但是它們沒有完全清楚的、十分“論証的”形态構造，因此，可以看作是真正屬於共同印欧語的基本詞彙以內的<sup>①</sup>。關於詞根与  $-ē/\check{o}-$ ,  $-ā/\bar{o}-$  (部分是  $-(ē/\check{o})i-$ ,  $-(ē/\check{o})u-$ ) 这样“構成詞干”的詞素的許多組合，也應該这样說；比較印欧語的  $*w'lk^u-o-s$  [狼](古斯拉夫語  $вълкъ$ ，希臘語  $lúkos$ )， $*g^uen-ā$  (斯拉夫語的  $жена$ ；希臘語的  $gunē$ ,  $c-ē < -ā$ ；但是在其他形式中，則有另外一種詞干，單數生格为  $gunaikós$  等)； $*ghost-i-s$  [客人](斯拉夫語为  $гость$ ，哥特語为  $gasteis$  [客人，复数]，拉丁語  $hostis$  [敌人])， $*sūn-u-s$  [兒子](古斯拉夫語为  $сынъ$ ，哥特語为  $sūnus$ ) 等等。“構

① 当然，从前这样詞的構造是可以論証的，但是这种可論証性並不明显，所以應該把它归入極远时代——个别語言分离以前的时代。

成詞干”的詞素的意义不明确，就証明这类構成的久远：这种不明确性使对应的合成詞的“論証性”不充分。

縱使当我们处理構造清楚的、能产的“非成語性”的構詞的时候，我們在構拟組成它們的詞素时，構拟的依然是比起个别詞素較多的东西。要知道，詞素是与它們的功能結構的特点如語根詞素、前綴、后綴（構詞性質及語法性質的），同时構拟出来的。因而往往構拟出詞形<sup>①</sup>和詞的某些形态类型以及形态学范疇，而通过形态学范疇也可能得到關於句法的某些結論（虽然一般說来，由於句法手段的相对局限性和“論証性原則”的巨大作用，在这方面的構拟会遇到重大阻碍；比較第22頁）。除此之外，当然，詞素（及其变形）的構拟，就会导致具有某些規律的語音体系的構拟。

由此可見，用历史比較法研究整个的親屬語言，虽然只能直接地構拟个别的事实，个别單位，首先是个別的詞素（在其各种变形中），但是历史比較法的应用也能使我們重造基础語的事实的一些这样的总和，而一般說来，这样的总和就能使我們判断該語言的性質，判断該語言構造的某些特点，判断該語言特有的一些規律。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必要条件，就是在構拟的过程中，把某些語言自古已有的共有單位（即这些單位同一起源是由於这些語言的親屬关系而形成的那些單位），与那些同一起源是由於借用而形成的單位区别开来，当然也要与那些某些其他情况（同时形成的單位、偶然的符合）而彼此相近的那些單位区别开来。

所以，历史比較法的应用是与語言之間起源关系的問題紧密联系着的，这不仅是由於用这种方法所研究的材料的数量和复杂性而产生的問題的性質，在某种程度上是取決於这些語言之間有沒有親屬关系，而且也因為將自古已有的共同的东西，即與語言的親屬关系

① 詞形（словаформа）就是指在某些語法形式中一定的詞。例如，городу（城市，單數與格），дом（房子，單數主格和對格），домов（房子，復數生格），都是在这些語法形式中代表 город 和 дом 的个别詞形。一般說来，这些詞都是整一系列的相应詞形的統一體（город，-а，-у……городах；дом，-а，-у……домах）。

联系着的东西区别出来,乃是更深入地联系、更清楚地了解每件个别事实所必須的。因为这时有可能把由於語言等同关系彼此联系着的它們事实結合成某种体系,有可能逐一分别确定这些事实,而且依照个别在該种体系中的地位,在这些事实对同一体系的其他事实的关系中确定它們。

32. 把自古以来为親屬語言共有的那些語言單位区别出来,而且在这些單位中找出屬於一个体系的那些特点,才是科学地确定这些語言親屬关系的基本因素。同时,特別重要的,就是注意以下几点。

(1) 如果某些語言單位具有真正自古已有的共同性,那末用历史比較法就会找出各种語言中彼此对应的詞,不仅在發音和一般意义方面,而且在它們形态学的特点方面,在同一个原有的詞中曾經是彼此一致的。例如,在斯拉夫語中 жена 和哥特語 qinō 不仅指明,它們共同的要素的音,曾經都是与 \*-g<sup>u</sup>en- 相近,都有近於 женшин (a) [妇女], жен(a) [妻子] 的意思,而且也指明这个要素是作詞根的一个詞素(确切些說,是这样詞素一个特定的变形)。同样,古冰島語 faðr [父亲,單数与格],不但是起源於發音和意义相同的單位 \*patri (希臘語的 patri 也是起源这个單位),而且还可以推断这个原始詞形 (\*pə-tri) 有过这样形态上的分化,依据希臘語的詞形 \*petr-i 也可以推断有过这样的分化。

但是在借用时,常常看到另外一种相互关系:一个語言所假定的某个單位自古已有的,或一般說来比較久远的形态構造,不可能認為是另外一种語言的同样形态構造。例如,对芬蘭語中以日耳曼語 \*kun-ing-a-z (> 古代高地德語 kuning [国王],古英語 cyning [公爵,国王]) 借来的 kuningas [国王] 來說,日耳曼語 \*kun-ing-a-z 是沒有形态分化的<sup>①</sup>。

① 特别是在芬蘭語 kuningas 中的 s 虽在几个間接格中也是不存在的(生格为 kuninkaan, 等),但它依然是像在日耳曼語的詞形中那样的后綴一詞尾(比較派生的詞 kuningas-ta, kuningas-kunta [王国] kuningas-suku [王族]等; kuninga(s) 和 kuninka(a)-, 是一个同素的变形)。

(2) 在作为親屬語言自古已有的各種共同單位的原型而被構擬出的各種單位中，往往發現它們共同的某些特點和外部結構的規律（音的組合，重音等的規律）。由此可見，自古已有的共同單位所以能夠區分出來，不但是由於在某一語系（語族）的一切語言或多數語言中，都會看得到，而且由於這些公共單位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是同類型的——當然是某些單位范疇的範圍以內（例如，詞根，後綴，詞形），例如，比較各印歐語言自古已有的詞素所特有是那種表現在詞素有規律的變形性質的元音交替。

但借用時常是在語言自古已有的單位的襯托下，由於外部結構的特徵而區別出來的。例如，希臘語 *kánnabis* 和古英語的 *hænep* [大麻]（及該詞的其他日耳曼語的變形），雖然在語音上是合規律地彼此相應的，但是不可以認為自古已有的共同詞。它們的語音形態的結構自身，就證明這是借用<sup>①</sup>。

(3) 某些語言共同的自古已有的作為詞根的詞素，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在現在屬於或過去屬於基本詞彙的詞中看到的。因此，往往在含有彼此相距很遠的詞的或多或少的一系列詞中觀察到使用這樣詞素的情形。比較俄語的 *братъ* [拿]，*убор* [收拾]，*беременная* [懷孕的]，希臘語的 *phéro-* [我帶]，哥特語的 *barn* [小孩]等 [印歐語詞根  $*-bh(\frac{\text{ö}}{\text{o}})r-$ ]。還可比較俄語的 *остров* [島]，*струя* [水流]，德語的 *strom* [水流]，英語的 *stream* [水流，潮流]等（印歐語  $*-sr(\frac{\text{ö}}{\text{o}})u-$ ）。

因此，應該指出，在不同語言中詞根相近的詞之間各種詞義-形態的不相符合，並不致引起這些詞根自古已有的共同性的懷疑。恰好相反，這樣的不相符合，證明在某些語言中這樣詞根的存在極其久遠，因而就可證明它們在基礎語言中已經存在了。在一種語言以及在

① 從一方面說，*kannab-hænep* 不能分成個別詞素，從另一方面說，依其語音的組成，這個詞不可能是一個印歐語的詞素。甚至假定這樣的借用也存在於共同印歐語中，那末也必須承認，在這裡並未有過借用詞的完全同化，而且借用詞也是作為非自古已有的詞區分出來的。



某一个語族的各語言中用这样詞根構成的詞的多样性和成語性,正是可以用上述这点加以說明的。

(4) 在自古已有的共同詞素中間,必然也有各种構詞的和語法的(構形的、詞形变化的)各种附加部分。

a) 關於構詞附加成分的情形,部分地提醒作为詞根的詞素所特有的东西:在基本詞彙的範圍內以及同时在彼此相距很远的詞中(構造的或大或小的“成語性”和意义的明确性或可变性,就是与这种情形有联系的)的应用,在这方面也是証明其自古已有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以 *-mo-* 这个形态而被構拟的名詞后綴远在共同印欧語中就已存在,这点未必是可以怀疑的:比較俄語的 *дым* [烟], 古斯拉夫語的 *рамо* [肩], 梵語的 *dhūmah* [烟], *irmah* [肩, 臂], 哥特語的 *arms* [臂]、德語的 *Arm* [手臂]、*Strom* [水流, 潮流], 等等。

但是必須記住:一般說來,構詞的附加成分也是可以“借用”的,就是說,可以从借用詞中分出来,並且用来構成新詞。例如,斯拉夫語后綴 *-арь* (俄語的 *пекарь* [面包师], 古斯拉夫語的 *боукарь* [書商] 等), 日耳曼語的 *\*-ari(ja-z)* (哥特語的 *bōkareis* [書商], 古英語的 *bōcere* [書商], *mylnere* 以及由此詞而來的現代英語的 *millar* [磨坊主人] 等) 和拉丁語的 *-āri(u-s)* (*molinārius* [磨坊主人], *librārius* [書商] 等) 的同一起源,是通过借用詞的途徑与拉丁語的 *-āri(u-s)* 的傳布有关。

很显然,“借用”附加單位的这种性質(通过在借用詞中把这种附加單位划分出来的途徑),必須是附加成分具有充分清楚明确的意義。同时,至少保存着几个这样的外来詞,而这种單位就是在这些借用詞中进到借用語言的(比較:借自拉丁語 *molinaris* 的古英語 *mylnere* 以及日耳曼語中新構成的詞 *bōcere* [書商], *fiscere* [漁人] 等)。除此之外,一般說來,在这样語言中必不可避免地要有这个所借用的附加成分自古就屬於的那種語言中的大量这样詞層及其他借用,因为所由借詞的那種語言的影响当然不可能只是严格地限於含有这个單位的那些詞。例如,大家知道,在各日耳曼語言中,帶有

ari(u-s)-\*-ari-(ja-z) 的像古英語 mylnere 这样类型的拉丁語借用,只是从民間拉丁語中借来的古代詞層的很小一部分。

一般可以說,如果沒有直接指示出有“借用”的情形,構詞附加成分自古就有的事实,比起它們被借用的情形更加可靠,虽然問題可能是始終都像印歐語的 -mo- 等这样例子中那样不容置疑。

6) 至於語法附加成分,那末大家也知道,借用的事实,是需要加以特別解釋的完全特殊的現象。这样附加成分的体系,甚至往往形容成語言的“不可滲透的”範圍。当然,这种形容只是一种形象的說法,而不是說明語法附加成分通常是不借用的那样一个事实。那末这个事实的說明究竟何在呢?

語法附加成分,也像構詞的附加成分那样,只能通过借在借用詞中把它們区分出来的方法借用的。但是为了进行这样的区分,需要借用同样一个詞的至少兩個語法形式。从丰富詞彙的角度來說,这样双重的借用是毫無意义的,因为縱使借用某一个詞的全部变化形式,也依然只是借用一个詞。但一般說来,沒有借用語法構造要素的必要①:“……語法構造的基础在很長的时期中都保留着,因为历史証明了,这些基础能够在許多时代中都替社会服务得很好”②。由此可見,語法附加成分体系的“不可滲透性”,主要是由於社会制度的改变、生产的發展、文化和科学的發展等而引起的充实詞彙的需要,乃是引起借用的直接的和重要的社会需要。

总之,确定語法附加成分的同一起源,通常是根据亲屬关系的,正是因此往往把同一起源看作是語言亲屬关系的重要証据。

(5) 上面已經說过,構拟个别詞素及其功能-結構的特征,就导致構拟一定类型的詞和語法形式(第42頁)。現在應該注意:如果語言有亲屬关系,即便个别詞和詞形在組成的構造方面的分歧,在引出

① 在这里还没有指出在句法方面兩種語言能够引起一种語言对別种語言的影响。應該还要除去“学术”借用等那些特殊的情况:像英語中 phenomenon (复数 phenomena) 这样的例子,与其說是严格的借用,不如說是从別种語言的“引用語”:这些例外,每种都有它們的特殊說明,並不破坏一般的情况。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3頁。

其他詞和形式的时候往往成为相符合的詞。例如, 斯拉夫語的 жена 和哥特語的 qinō 只是在詞根方面(印歐語 \*-gʷen-) 是同一起源的: 在這些詞形中結尾的 -a 和 -ō 彼此並不符合<sup>①</sup>。但是一般說來, 斯拉夫語 жена 中的 -a, 在哥特語中依然找到对应的音, 而哥特語 qinō 中的 ō, 在斯拉夫語中也找到对应的音。即斯拉夫語的 -a 在像 airpā [土地] 这样單数主格的哥特語的詞形中找到对应的音, 而哥特語的 ō, 在像單数主格的 камы [石头] 这样古斯拉夫語的詞形中找到对应的音。一般說來, 大約得出下列这样对应的系統:

斯拉夫語	-жен-	-a
哥特語	-qin-	.....ō
哥特語	(-airp-)	.....-a
斯拉夫語 (-кам-)	.....	-ы
• (古斯拉夫語)		

(在这里同一起源的單位是上下相对的, 而在該示意圖中, 一般不能对比的音則放在引号里面)。

这样的相互关系, 虽然通常不这样繪圖表示, 但是在对各种亲屬語言的个别詞形进行历史比較法对比的时候, 这种相互关系則是典型的; 在原則上, 这种相互关系, 也像在希臘語 γενεή—梵語 janitā 这类对应的例子(在其中一切个别詞素都是相应一致的)一样可以証明一定类型是自古已有的。因此, 有些学者所提出的整个詞完全对应的那种要求, 是沒有根据的: 整个詞(詞形)自古已有的事实, 應該不是依据某些詞(詞形)在其他語言中对应(或不对应)来确定的, 而是依据組成这些詞的詞素之間相互关系的性質来确定的。

(6) 最后, 还必须注意: 作为所比較的不同語言單位的同一起源最重要标准的語音对应規律性, 严格說來, 只有在屬於或至少从前曾屬於語言結構自身因而随着某种語言整个体系的遞傳而代代傳遞的那些單位中出現的时候, 这种規則性才能証明某些語言的亲屬关系。

① 一般說來, 斯拉夫語的 a(<ā) 与日耳曼語的 ō 是符合的; 但是在某些音节中由於日耳曼語中沒有重音, 这种符合就有变化了。

其所以需要注意这一事实,是因为就在基於借用而發生的等同現象的情形下,有时也观察到一定程度的語音对应規則性。当存在大約屬於一个时代,具有共同泉源和由於同一途徑而滲入的一定的借用詞層的时候,我們就观察到这样的規則性。有时,在一个时代确立的这样的对应,就是在后来也可以構拟出来,因此,这样的对应的規則性涉及到很大数量的詞。例如,在欧洲語言之間相当規則的語音对应体系,是現代在国际詞的某些类型的範圍內形成的:比較俄語的 *формация* (結構) [-ts-], 德語的 *Formation* [-ts-], 法語的 *formation* [-s-], 英語的 *formation* [-f-] 等; 俄語的 *социальный* (社會的) [-ts-], 德語的 *sozial* [-ts-], 法語的 *social* [-s-], 英語的 *social* [-f-]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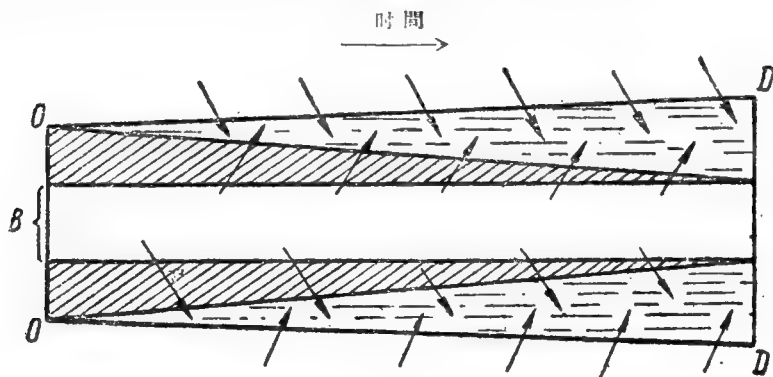
在这里,与基於語言的亲屬关系的那些关系几乎沒有共同之处。那怕就是我們不知道这些詞的真实历史,我們也不会把这些詞中有規則的語音对应,看作語言亲屬关系的表征,因为这些語音对应並不是这些語言中陈旧結構的要素保存着那些部門所特有的。在作为基本詞彙的詞根構拟出来的詞素中,在这些詞根有联系而往往不經科学分析就不能区分出来的那些構詞附加成分中、以及在語法性質的詞素中(在变格詞尾,变位詞尾中),我們便看到其他一些有規則的語音对应,正是这类語音对应才反映出語言的亲屬关系来。由此可見,这里的問題不是在於量的因素;重要的是,某些对应現象在語言的哪些部門中才是規則性的。当說到久远的一些时代而沒有發現借用的直接历史依据的时候,尤其是要注意到这点。

#### 四

33. 虽然在用历史比較法研究語言的亲屬关系时,最后構拟的是比这些語言所共同的少数自古已有的一些詞素發展的“原始的”阶段較多的东西(比較三),但是構拟这些語言(直到有关的基础語言)古代历史的結果,依然應該認為是或多或少有限制的和有条件的,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个方法自身所存在的缺点。

首先必須始終記住：一切个別的親屬語言是作為某種體系而繼承基礎語言的。而這種體系又是在代代相傳時不斷用作重要的交際工具的。而且這些個別語言只是历史上與基礎語言等同，而不是在質和量的關係方面都是等同的。如上面已經指出的，其實每種個別語言在其具體組成和構造方面，可能有很多已經變化了的新東西，可是在這種語言中間也可能缺少基礎語言原有的許多東西。正是因此，“基礎語言”這個術語，就其實質來說，比起“母語”這個術語（甚至就是把與這個術語相聯繫的一些錯誤觀念和馬爾對它的真正的科學內容的曲解都去掉）好得許多：“基礎語言”這個用語，就使我們注意到：某些親屬語言依然通過交際的歷史聯繫方向所從起源的那個語言，從這些語言的具體組成和構造的角度來說，只是它們的基礎，而不是它們中間一般具有的一切東西的泉源。由此可見，這個術語正是預防我們過於直線式和簡單化地去理解“某些語言從一種語言發展而來”的說法。

一般說來，如果只依照起源於基礎語言的一種語言的方向來看基礎語言的發展，那末可以用下圖來表示這種情形：



圖中 O—O 表示基礎語言，B 表示它被構擬的部分，因為這一部分在從基礎語言發展而來的某種語言 D—D 中也表現出來。從基礎語言中所喪失的東西，用密集的斜綫表示之。繼續的平行綫表示

D—D 語言在它从基础語言發展而来直到它有文献可考的某一阶段的时期所增加的东西。箭头表示,新的东西一部分是自外而来,而一部分是自基础語言中原有的东西形成的。当然,这个示意图是很簡單的而且也是片面的,但是它依然是相当正确地描繪出某些本質的东西。重要的是,它表明某种語言从基础語言的發展不是把全部基础語言重建起来,因为作为該語言發展的远古阶段的基础語言自身也不是全部都可以構拟的。要知道,依据历史比較法的本質來說,某些語言已經喪失的东西是不可能構拟的,因为構拟是根据过去事实在这些語言中所遺留的“痕跡”来进行的。

例如,在斯拉夫語 *жена*——哥特語 *qinō*——希臘語 *gunē*, *banā* 等詞自古已有的起首輔音,重拟为 *g<sup>u</sup>*, 因为即便是个别的印欧語言也是保存了它的軟顎音性質,(比較 *gunē*, *qinō*……),它的濁音性質(比較 *жена*, *gunē*, *Banā*……),它的破裂音性質,(比較 *gunē*, *Banā*, *qinō*……),指出它的唇音性(比較 *Banā*, *qinō*……)以及指出它的不送氣性質。

十分可能,基础語言的一系列語根詞素随着它們所在的那些詞一起消逝得無影無踪,而在基础語言与从它發展出来的那些有文献可考的親屬語言相距年代久远的情况下,應該承認这种消逝是不可避免的<sup>①</sup>。但是附加成分也可能不是全部都保存着,或者一般也只是遺留下某些痕跡。語音体系可能最充分地構拟出来。例如,各种音(音位)的数目,通常不超过几十个,而且很可能在保存下来的詞素中(詞根和附加成分)这些音都能这样或那样地(縱使是間接地)反映出来。

34. 其次,把詞(詞形)分成个别詞素所以必要,是与历史比較法的實質緊密联系着的,这种必要性自身就能在某些情况下引起極大困难,而这些困难又使構拟工作或多或少的不明确,因而構拟的結果,在某种程度上不准确甚至令人可疑。

① 參看《根据斯大林著作闡明苏維埃語言学的任务与‘語言学問題’雜誌》(社論),刊載《語言学問題》,1952,第1期,第20頁。譯文見《語言論學文選譯》第二輯22頁以下。

在这里首先必須注意下面一点：

詞素(或其特定的变形),是历史上發展着和变化着的單位。詞素(及其变形)不能說成某些固定的單位。在語言發展的过程中,發生个别詞素的結合(溶合)以及詞素結合的再分解<sup>①</sup>。

例如,印欧語的三个詞素的詞形 \*g<sup>u</sup>en-ā-m (單数役格)变成斯拉夫語两个詞素的詞形:比較俄語的 жЕН-у (妻子,單数役格);在这里,一个附加的斯拉夫語詞素,是相當於自古已有的两个詞素。因此,区分出詞素(以及其他形态單位:詞干,复合詞的構成部分等),需要經常与語言的特定的發展阶段相应,也就是說,使之归入特定的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工作复杂起来,况且历史比較法自身不能做出語言發展的整个历史远景(比較 28 节)。例如,印欧語單数主格的 \*g<sup>u</sup>enā——單数役格 g<sup>u</sup>enām,單数主格 w<sup>l</sup>k<sup>u</sup>os——單数役格 w<sup>l</sup>k<sup>u</sup>om 这种类型的相互关系,就使我們区分出这样的一些詞素,如構成詞身的 -ā- 和 -o-, 变格后綴(詞尾) = ( ), (就是說,在 \*g<sup>u</sup>enā 等詞中是“零位”), -s 和 -m, 因为像 \*g<sup>u</sup>enām 也可划为 \*g<sup>u</sup>en-ā-m, 但是 \*g<sup>u</sup>enā 的复数生格直接地構拟为 \*g<sup>u</sup>enōm 或 \*g<sup>u</sup>enóm (古斯拉夫語的 жЕНЬ, 俄語的 жЕН 即由此而来): 在这里,沒有根据把構成詞干的詞素区分出来,而且实际上我們也看到这样發展的阶段,而这样的阶段中構成詞干的詞素(例如 -ā-),已經与詞尾溶合一起,或者在詞尾前可能消逝。我們在看到單数主格的 \*g<sup>u</sup>en-ā 和單数役格的 \*g<sup>u</sup>en-ā-m 时往往期待有單数生格的 \*g<sup>u</sup>en-ā-om 的存在,但是我們沒有構拟这样形式的直接資料。同时还發生这样一个問題:對於存在已經縮紧的复数生格 \*g<sup>u</sup>en-ōm 或者存在显然类比的 \*g<sup>u</sup>en-óm 那个时代來說,我們把 g<sup>u</sup>en-ā-m 等分为三个詞素、而不是两个: g<sup>u</sup>en-ām), 其正确的程度究竟如何。正像可以看到的那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区分为某一时代所構拟的詞素,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困难。

① 參看: B. A. 波戈罗第茨基:《語言学及俄語綱要》, 1939 年,第 153—4 頁,第 171 頁,第 193—5 頁;同时參看: Л. А. 布拉霍夫斯基:《俄語中的語源中斷》,俄語研究所叢書, 1949 年,第 1 卷,第 147 及以下各頁。

35. 同样重要的是还要指出, 一般說来, 詞素的划分是会引起所比較單位的範圍縮小的結果: 个别詞素的語音外壳往往只从兩、三个語音組成, 而有时則从一个音組成。同时, 进一步加深形态分析, 一般說来, 更加縮小所比較的單位的範圍。而且, 很显然的是, 某个單位的物質外壳中的音数愈少, 偶然符合的可能性就愈大。因此, 就产生这样情形: 加深形态分析, 就为所做出的結論具有更大不可靠性造成某些前提。同时, 比較更古的詞素融合成比較“大的”新的詞素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与更古的詞素的減少同时發生的), 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复合詞“簡化”和“重新分解”的过程, 都是时常观察得到的过程, 这些过程是不应忽視的<sup>①</sup>。在某些已知單位的組成中發現更古的詞素或其殘跡, 對於深入研究它們形成的历史, 因而對於深入研究有关的語言中構詞的历史以及對於扩大那种經過历史比較研究的基本材料來說, 都很重要。一旦我們在拉丁語詞干 *dent-* (*dens*, *dentis* [牙齒]) 中区分出古老的, 已經死亡的(拉丁語以前的)詞素 *-d-* 和 *-(e)nt* 来, 我們就不能揭露出与 *edere* [吃] 这个動詞的古代联系, 也不能理解这个詞远古的意义結構(“在吃着”)。从另一方面說, 在进行这样区分时, 作为詞根的詞素就以 *-d-* 的形式, 即只以一个音的形式区分出来了。这样的 *-d-* 單獨地只是某些对比的很弱的支柱。梵語的 *dat-/dant-*, 希臘語的 *odont-*, 拉丁語的 *dent-*, 哥特語的 *tunþ-* 等的親屬关系, 只是因为这些整個詞身之間的相互关系, 才是不容置疑的。印欧語的 *\*dnt-/dont-* 这个詞身是十分可靠地構拟出来的。同样, 与 *-ēd/-ōd-* 交替的 *-d-*, 主要也是根据已知的語义結構的第二个假定要素 *-(o)nt-* 的准确性和一般的明显性才区分出来的。凡是沒有这样有利条件的場合, 类似形态分析那就決不可靠了。例如, 請比較: 說日耳曼語 *himin-* 这个詞干(我們在哥特語 *himins*, 古冰島語 *himinn* [天] 中看到这个詞干)是上溯於印欧語的 *k+e+men-*; 这种說法最好也只能是一种聰明的假設。

① 參看上頁的附註。



發現“決定詞根的要素”(Wurzeldeterminative)或“融合”、“擴大”(élargissements, Wurzelerweiterungen)以及印歐基礎語言更古形態結構的其他痕跡,就使我們一方面加深對印歐語言材料的形態分析,看出不同語言單位之間新的聯繫以及在某種程度上構擬它的歷史發展;從另一方面說,這些成就還為科學-幻想的結構開辟出廣闊的領域。滲入到印歐基礎語的遠古歷史的某些甚至是考慮極為周詳的嘗試,暫時只是引起一些有趣的假設;這種情形可以由下面一點加以証實:就是對這個任務予以不少注意的十分認真的研究者“重建”該語言的形態單位形成的本質上不同的“歷史”。所有這種情形,就指出必須進一步研究歷史比較法的应用原理、用這個方法所得結果的可靠性標準以及這個方法與“語音-形態分析法”的相互關係,而語音-形態分析法也應該予以同樣的科學研究和嚴格的評價。

36. 最後,應該始終注意:作為構擬方法的歷史比較法,只能提供好像是平面的,繪得沒有遠景的圖畫,在這幅圖畫中不同的時代能夠兼容並列於一個平面上。甚至用這個方法構擬的語音系統的要素,能夠不像它們被構擬的形態那樣一齊都同時存在。

因為在基礎語言中確實存在的形式與只是後來在個別語言中平行形成的形式之間,並非時常能夠劃一界綫,所以語法體系中個別部分的存在可能引起很大的懷疑。例如,上一世紀末和本世紀初語言學家描繪出的印歐基礎語言的變位和變格的複雜圖畫,在許多部分是值得懷疑的。很有可能,在這個圖畫中我們看到以後很久在個別語言中形成的許多詞在基礎語言底面上的投影。但是,只是用一種歷史比較法,未必能夠把不同階段準確而有充分把握地區分出來。誠然,大家知道,各現象的相對的年代往往是被歷史比較法或多或少明確地規定的。但是必須注意:這只是適用於像斯拉夫語言中由 *oi* 轉變為 *ѣ* 和 *ѣ* 軟化為 *и* (以及 *г* 軟化為 *ѣ*) 這類緊密聯繫着的那些現象。很顯然,例如, \**k<sup>u</sup>oinā* (比較立陶宛方言 *kaina*, 希臘語 *poinē*), 只是通過 \**kѣna* 這個階段才能轉變為 *ѣѣna* [價格], 因為先前已經喪失唇音性質的 *к<sup>u</sup>* 的軟化,是取決於後面元音 (*ѣ*) 的顎化性質的,而

在从前的 *oi* 之前,这种軟化是不可能的。显然,彼此紧密联系的这样现象,大半都是在語音方面所看得到的。

从这方面說,特別應該注意:一个现象涉及范围(即共同性的程度)的大小,不能作为該现象悠久程度大小的准繩。涉及范围較大的(共同性較多的)现象,不一定是較古的现象,涉及范围較小的(共同性較少的)现象,也不一定是較晚的。例如,在一切日耳曼語言中,如果鼻輔音在 *h* (即 *x*) 之前消逝(比較:哥特語 *þagkjan* [-*ŋk*-] 的过去时 *þāhta*, 古代高地德語的 *dencan* 的过去时 *dāhta*, 古英語 *þencan* [想] 的过去时 *þōhte*, 古冰島語中 *þækia* [从 -*nk* 变为 -*kk*-] [看出] 的过去时 *þátta* [从 -*ht*- 变为 -*tt*-]),而在鼻輔音在 *þ* 之前消逝,只是在各英格溫(ИНГЕВОН)諸語言(盎格羅·弗里茲諸語言)中才有这种现象;比較古英語 *ōþær*, 古撒克遜語 *ōthar*, *āthar* [其他], 而哥特語为 *anþar*, 等),那末这並不是說,共同日耳曼語中先發生 *h* 前的鼻音消逝,然后各英格溫語言中 *þ* (以及其清擦音) 前的鼻音消逝。一般說來,在兩種情況下鼻輔音的消逝的现象很可能是同时發生的,但是这个现象發生的条件,随方言之不同而有差別。在一些語言中(哥特語、古代高地德語)中,鼻輔音只是 *h* 前才消逝,而在其他一些語言中,鼻輔音消失的場合比較多些(在各英格溫語言中,鼻輔音在一切清擦音之前都消逝)。在个别情況下,涉及范围較大的现象,比起涉及范围較小的现象甚至可能發生得晚些。

至於絕對的年代,那末在这里用历史比較法显然是不能得到某些具体資料的。關於某些語言發展的已有文字可靠的远古阶段与这些語言發展的構拟阶段之間的时间距离,只可能得到某种近似的估計。但是严格說來,在这里只能以下述的原理确定一个最低限度准确性。这个原理是,語言在其發展中只是由於新質态的逐漸积累和旧質态的逐漸消逝而变化的。但是在这里沒有任何的最大限度的准确性,因为变化可能非常迟緩,而且長期停滯在个别的一些阶段上。

我們既然借助於历史比較法深入到文字以前的語言發展时代,那末我們就不可避免地与使用这些語言的人們的具体历史失去直接

接触。但这决不是说，我們應該甘心安於这种情况。要知道，“要了解某种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發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創造这种語言、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sup>①</sup>。因此，与我們借助於文献所知道的社會历史失去直接接触的可能性，就使我們更有特別需要从創造这种語言，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研究語言历史的其他方法。应用历史比較法来構拟文字以前語言的历史發展的事实，就需要用历史的材料，特別是用物質文化史的材料帮助和补充語言材料。但是为要做到这点，就必要發展和改善对比某些材料的各种方法。这方面的工作，需要語言学家和考古学家巨大的协同努力，同时还需要巨大的科学坚定性和严肃性，因为在这方面很容易产生阻碍科学計劃發展的一些不同的虛幻想法。

---

① 参看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0頁。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

統一書号：9031·29

定 价：0.28 元